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2024年第1期（总第51期）



胡适研究会编 宋广波 主编

2024年5月25日



曹伯言、曹杨 汇校《胡适留学日记》

目 录

宋广波著《胡适年谱长编》审读意见	耿云志 (1)
《胡适留学日记》汇校说明	曹伯言 曹杨 (2)
胡适与徐复观的晚年交往 (1958—1962)	
——徐复观与胡适及胡颂平未刊书札五封考释	楼庭坚 (6)
胡适“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	肖伊绯 (13)
胡适先生与北京西山	李新风 (18)
苏甲荣致胡适信六通	王震 整理 (26)
大文书局《胡适新选》伪书考	杨镇源 (32)
抗战胜利后的胡适、傅斯年与北京大学	郭衍莹 (33)

宋广波著《胡适年谱长编》审读意见

耿云志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胡适研究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胡适由一个完全反面的人物，变成学者可以正面研究的重要历史人物。由于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起着引领教育、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对胡适进行实事求是地，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势必影响到对整个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文化的重新认识。现在，胡适研究的成果相当丰富，相关的资料在海内外都有新的发现。由于胡适的思想与活动牵涉面非常之广，与其相关的材料，分散于海内外各地。现有的胡适研究著作，以及胡适相关资料的结集，基本上都是集中呈现某个阶段，某个方面，需要有一种能够综合呈现全部重要材料的书，以为研究者提供检索和参考的方便。这样的书，以年谱长编的形式最为合宜。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曾编有一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当时做胡适研究的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自那时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新材料大量增加，那部年谱，已远不能满足学者的需要。

宋广波所著的这部《胡适年谱长编》的最大优点，是“最充分最详尽的占有资料”。本谱材料来源广泛，不仅包括胡适本人文献，还包括公私档案、报刊杂志、私人记述等各方面的材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的精华部分，均已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大套书中，但本谱编撰者长期查阅全部档案，进行仔细的排比、

爬梳，仍从中挖掘出不少传记材料。台北胡适纪念馆藏胡适 1949 年后的档案，经作者细加搜检，择其要者入谱。此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史语所，以及台北“国史馆”所藏有关胡适的文献，书中亦有大量引用。因此，这部年谱长编应是迄今有关胡适生平、思想、活动的资料最全面最详备的结集，它会给胡适研究提供许多新材料和新线索。这是编者积二十年的辛勤积累而成的一部力作，全书正文达 500 万字，可谓鸿篇巨制。

除了资料详备，此书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出来：

其一，书中不加编者的主观议论，只以材料呈现谱主的事实及其思想。

其二，因谱主一生著作甚丰，活动涉及诸多领域，原始材料太多。所以，编者做了必要的剪裁，详略得当。

其三，这部年谱长编修订了以往研究胡适的著作中的不少错讹。

其四，此书文笔简练、流畅，相关内容前后照应，显得有贯串，有连续性，虽属资料书，仍具可读性。

其五，此书体例完备，书后附有《人名索引》，便于检索。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书，不仅能使人了解胡适全貌，在胡适研究界发挥基本参考书的功用。而且还将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胡适留学日记》汇校说明

曹伯言

曹杨

一、日记价值与版本流变

胡适早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资助，于 1910 年至 1917 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胡适能在回国短短几年间脱颖而出，“暴得大名”，与这七年的留学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他“一生思想事业的准备期”。而他留学期间所记十七册四十多万字的日记和札记，则详细记录了他留学期间的所思所想及求学、生活、交游的情形，真实而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留学生活。在 1939 年亚东版的《自序》中，胡适称这些留学日记为“自言自语的思想手稿”（thinking aloud），并说：“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故这些日记不仅是其传记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这位一代学人的可靠史料，对了解胡适的思想成长和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同时，它不仅是胡适个人成长的心灵史，也是了解近代中国留学生史的极好途径。

《胡适留学日记》最初是由其好友许怡荪摘抄推荐给了《新青年》杂志。因此从 1916 年 12 月 1 日的第二卷第四号直到 1918 年 9 月 15 日的第五卷第三号，《新青年》一共连载了 11 期，前后历时近两年。

《胡适留学日记》最初于 1939 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整理排印出版。胡适“主张以原稿有几册就分几卷”，故日记共分为 17 卷，编为 4 册。亚东的编辑，也是胡适的多年好友章希吕于 1933 年专程赴北平，住在胡适家中，对日记手稿做了认真细致、卓有成效的编辑整理工作，得到了胡适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

1947 年 11 月，胡适将日记移至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修改书名为《胡适留学日记》。在《重印自序》中，他对此作了说明：“我同亚东图书馆商量，

请他们把全书的纸版和发行权让给商务印书馆。这件事现在办好了，这十七卷日记就由商务印书馆重发行了。”由此可知，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本是根据亚东图书馆 1939 年版的纸型重印。1957 年，胡适又改正了日记中的几个错误，即交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多年来，先后有海南出版社（1994 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湖南岳麓书社（2000 年）、同心出版社（2012 年）、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4 年）等多家出版社影印或排印出版《胡适留学日记》。但《藏晖室札记》所开创的体例，一直被沿用至今。

2013 年，失落多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重现于世，堪称 21 世纪以来胡适研究史料发掘方面最重大的发现（一同现世的还有胡适 1917 年学成归国后所著《北京杂记》和《归娶记》的手稿，从未公开出版，尤为珍贵）。2015 年 8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仿真影印的形式将这批珍贵的文献赅诸社会，不仅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胡适留学日记》的汇校工作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二、版本差异与汇校凡例

《胡适留学日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首次整理出版前，亚东专门派出骨干编辑，同时也是胡适的多年好友章希吕于 1933 年 11 月赴北平，住在胡适家中，对日记手稿进行整理校勘，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直至 1934 年 7 月才结束，前后历时 8 个月。具体工作包括日记整体架构的确定，文字内容的整理校勘，剪报和图片的增删以及增补图注文字等。章希吕还从第三卷开始，开创性地为每篇日记起了小标题（还提出了拟定小标题的三原则），并将胡适原标注于每篇日记后的写作

日期前移至小标题后，同时为全书新增了目录，便于读者检索，这一系列专业而细致的编辑工作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他每整理完几卷，便寄回上海，由亚东的另一位骨干编辑余昌之负责排印和“末校”。

对日记的校勘整理工作，胡适是放心放手让章希吕、余昌之去做的，他自己先后审阅过两次。第一次是章希吕每整理并抄好一卷，即交胡适审定。对手稿内容的增删及修改等，当是此时所为。第二次是审阅末校样。在这一时期章希吕致余昌之的信中，他多次关照后者，将每卷的末校样校好，“在未打纸版之前，都寄来交适兄一阅……此事虽费事，但于书的本质定可格外好点”。

为排印清楚起见，章希吕甚至从第五卷下半部分开始，将手稿重新誊抄了一遍，一边抄一边整理。其认真细致的工作得到了胡适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在《自序》中特地说道：“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因手稿遗失多年，几十年来，世人所见均为排印本，故其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与手稿本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差异有多大，等等，多年来一直无从校勘考证。本次汇校，以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9 年版《藏晖室札记》（以下简称“亚东本”）为底本，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以下简称“手稿本”）为对校本，以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上海商务本”）、台北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台北商务本”）为参校本。这是《胡适留学日记》出版八十多年来第一次全面、系统、规范的校勘。汇校以客观展示差异，真实再现原貌为原则，严格对照校讎，凡遇差异之处，皆出注说明。同时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对手稿本中的中外文剪报、图片乃至卷首卷末的零散杂记等，均以影印方式悉数补入，故相比现有的通行版本，不仅图文内容大为丰富，手稿原貌真实再现，更使读者第一次得见亚东本与手稿本之间的诸多差异，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客观的基础材料，胡适先生欲使其日记图文并茂的愿望也在百年之后得以完整实现。

据汇校所见，亚东本与手稿本的差异，除了标题、目录等显而易见的差异外，主要体现在文字、剪报、图片这三个方面。因为这些方面也正是汇校整理的重点所在，一并陈述会更有针对性，行文也更顺，所以我们就将差异和汇校凡例一并叙述如下。

（一）文字

胡适一生重视写日记，但他的日记常在匆忙中写成，不少地方写得比较简单，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所思所想。留学日记自然也是如此。另外，回望自己多年前的日记，有所欠缺是自然的，故他在整理出版时的增删修改及补注说明等也是自然的了。例如：

1. 1911 年 2 月 15 日的日记中，有一则记载仅十个字：“无忘威尔逊教授之讲演。”对于这条记载，大概除了胡适自己以及和他同时听课的同学外，其他人看了都不知所云，所以在整理原稿时，胡适在其下加了一条近 200 字的“补记”。

2. 1911 年 6 月，胡适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夏令营，一时为耶教经师和信徒的说教所感动，在一次夜间聚会中，他起立，自称“愿为耶稣信徒”。后来整理原稿时，他觉得“这册日记太简略”，于是不仅特意找出当年给章希吕和许怡荪的信，附在此条日记后，让人能知道这件事的全过程。更再加“追记”，表示对当年耶教经师和信徒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的“把戏”的“深恨”，并认为这“是一件个人历史的好材料”。

3. 1916 年 7 月下旬，胡适特地用白话做了一首长诗，批驳梅赜庄反对用白话作诗作文，使他和一些朋友本就存在的文言和白话之争更加尖锐激烈。他将双方针锋相对的来往信件、摘要记入当时的日记，但因太匆忙，很难周全。1933 年整理原稿时，他在摘录梅赜庄来信的相关段落时，依照原信又作了不少重要补充，真实完整地再现了两人在观点上的尖锐对立和梅的冷嘲热讽。同

时，他还将日记中原有的致任叔永的信件摘录换成了全文，让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当年的真实思想和心情。

类似情况，日记中颇多。

对文字方面的汇校，约定凡例如下：

1. 改繁体直排和旧式标点为简体横排和新式标点。原文未点断者，酌情点断。凡亚东本与手稿本有不同者，均于当页出注说明。凡手稿本中的文字，有亚东本未收者，也一律当页出注说明。

2. 亚东本中有少量胡适对引文的注释是夹排在引文中的。为方便阅读，我们将其中一些过长的注释移为页下注，并注明“胡适原注”。此类情况多见于诗词引文。

（二）剪报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的一大特点，便是胡适在其中黏附了大量的中外文剪报和图片。胡适对此十分热衷，他在1914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吾近所作札记，颇多以图画衬写之，印证之，于吾国札记中盖此为创见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的确也是益处多多，剪报不仅是文字的“衬写”和“印证”，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史料，为探寻胡适的思想形成的轨迹提供了路标，也使普通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据粗略统计，手稿本共附剪报近百则，绝大多数是英文，小部分是中文，还有一则日文剪报。所涉内容十分博杂，甚至有两则禁酒广告的剪报，大概也因其文字诙谐幽默，被作者附在了日记中。当然，大部分剪报为胡适所关注的重要时政消息和社会新闻，及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演讲和得奖的消息或报道。亚东本完整收入约44则，节选重要段落或结语的近10则，其余的或因字迹模糊，或因文字太长，同时还考虑到当时亚东的外文排版和制版有难处，皆被删。虽被删，但其中的要点或中心大意，大都在日记中有摘录。收入亚东版的英文剪报，有不少的要点或段落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一些可能是章希吕根据一般读者的需要所做的。

手稿本中所附中文剪报虽不多，但史料价值

很高，只是有时这些剪报的编校质量有问题。如有一条记“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证据”，文前胡适说：“偶检故纸，得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中所搜得之证据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不了了之，他日青史终有公论，吾故以此诸件黏于左方。”这些证据，当时国内各大报多有刊载。胡适所附的是1913年4月27日上海《大共和日报》，共四十三件。章希吕整理时，“疑心有多处错误，但适兄事既忙，虽经他看过一遍，也非查报不能解决”。他认为上海《申报》“较靠得住”，就函请余昌之去查阅民国二年三四月间的《申报》。果然，与《申报》对照，《大共和日报》所载的四十三件有许多错误和缺漏，其中一件中便有六七处错误。

针对日记剪报部分的情况，汇校约定凡例如下：

1. 中文剪报

（1）如亚东本已逐字逐句排入，内容与手稿本完全一致，则不再收录；

（2）如亚东本未排入，但已有剪报的内容简介或摘要，为体现其完整性，仍采纳全文，并于当页出注，每卷需增补的剪报以影印形式作为附录集中呈现于每卷末；

（3）如亚东本未排入，也无剪报内容简介或摘要，于当页出注，剪报以影印形式作为附录集中呈现于每卷末。

2. 外文剪报

（1）如亚东本已逐字逐句排入，内容与手稿本完全一致，则不再收录；

（2）如亚东本未排入，但已有剪报的内容简介或摘要的中译，为体现其完整性，仍采纳全文，并于当页出注，每卷需增补的剪报以影印形式作为附录集中呈现于每卷末；

（3）如亚东本未排入，也无剪报内容简介或摘要，于当页出注，剪报以影印形式作为附录集中呈现于每卷末。

将每卷增补的剪报集中呈现于卷末，主要是为避免过多剪报的插入使日记正文时常被隔断，影响阅读，同时也并非每件剪报的内容都与日记

正文关系密切，读者可按需选择阅读。

（三）图片

据统计，手稿本共应有图 242 幅，实存 163 幅，缺失 79 幅。亚东本实收图 110 幅，未收图 134 幅，共计 244 幅。亚东本两者之和应与手稿一致，现有 2 幅的差距，应为当年整理出版时的增减所致。手稿本中的缺空，多为当年取出制版后未能及时归位及以后的年久脱落散失所致。亚东本中的缺空，则是当年整理出版时，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因当时的排版校对技术所限，胡适“答应照片可删的尽量删去”。但亚东本出版时，对图片也有少量的增补，这就造成了亚东本与手稿本在图片数量上的不一致和互有缺漏。

汇校对亚东本和手稿本的图片作了细致的校勘比对，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凡手稿本中有图片而亚东本未收者，一律收录，置其于原所在手稿本位置，并出注说明。凡亚东本中有图片而手稿本未收或两本皆未收的，也于当页出注说明。

1934 年 3 月，章希吕在给余昌之的信中曾说：“照片适兄坚持插入书中，汇印一处不好。我现在抄了几册，也觉得有些照片确非印与文字相连处不可。”因此，我们将补入的图片插入正文，而非集中于每卷末附录，既是尊重胡适原意和手稿本原貌，同时方便读者参照阅读，另也可避免附录过于臃肿。

关于汇校，还有几点说明如下：

1. 当年整理出版亚东本时，曾对手稿本中的个别文字、剪报或图片作了删除，当然这些删除都是由作者本人所为或是经过了他的审定的。凡遇此，汇校均出注说明，并尽力对删除的内容予以恢复，以还其真实原貌。如有些被删除文字难以识别，则将其整体影印，以图片形式插入原所在手稿本位置，并出注说明。

2. 胡适在每则日记后都标明了日期，但他有时会在同一则日记中记录多件事或多条札记。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检索，章希吕在编辑整理时将不同主题的内容分拆单列，并另拟标题、加注日期。

如此亚东本便有不同于手稿本的同日期的多则日记并存的情况，谨此说明。

3. 汇校时发现，在几卷手稿本的起始或卷末，尚有一些胡适随手记录的日常开销账单、通信记录、友朋往来、杂事备忘等。可能是因为较为杂乱和零散细碎，当年整理出版亚东本时一概未收，此后迄今的所有版本自然也是付之阙如。此次汇校，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同时鉴于其中一些文字较难辨认，故均以影印形式补于原所在手稿本位置，并出注说明。这部分内容为首次面世，经初步检视，有些内容尚有一定价值，可供研究之用。

4. 2013 年与手稿本一同发现的胡适回国后所记《北京杂记》和《归娶记》，当时章希吕曾建议一并收入，列为第十八、十九卷，但胡适认为不妥。章在 1933 年给汪原放的信中写道：“这两卷他不愿意加入，我亦不好坚持。他以札记到《归国记》止作一结束较好。回国以后所记将来另行编印。”可惜后来不仅未能“另行编印”，这两册的原件也不知所踪多年，直至 2013 年重见天日。考虑这两册虽为其回国后所记，但与留学日记在写作时间、体例、载体上均有相当自然的延续性，故作为附录置于留学日记之后。

5. 因手稿本缺少第一卷，故该卷无从校勘，仍同亚东本第一卷，特此说明。

汇校不仅要耐得住青灯孤影的寂寞，更离不开各位同仁友朋的鼎力相助。值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要向为本书工作提供帮助的各方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尤其要感谢为校勘中的英文手迹识别提供帮助的朱子仪先生，感谢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责编徐矜婧，更要感谢一直关心本书出版，并欣然作序的著名学者、胡适研究权威耿云志先生。

因《胡适留学日记》著于 20 世纪初，初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故一些文字及标点使用存在与现今通用规范相违之处。为完整体现本书的文献价值和时代特色，汇校时对于此类问题均未作改动，只改正明显的排印错误。书中所涉译名，有些与

现今通用译名不符，也均保留原文，不作改动和统一。

汇校本旨在校勘手稿本与排印本的异同，为广大读者及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客观真实的基础范本，以供他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因手稿本所含内容较为庞杂，间有中外文剪报、图片等多项内容，且当年整理出版时又经编辑及作者的多处修改及增删，情况较为复杂。汇校中，一些校勘体例较难在全书一以贯之。个别只能一事一

例，个案处理。因此，尽管汇校者已尽力做到汇校的规范和统一，但仍不免有所错漏，还请读者不吝指教，便于我们及时纠正。

2024 年 4 月 28 日

（曹伯言，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已故；曹杨工作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适与徐复观的晚年交往（1958—1962）

——徐复观与胡适及胡颂平未刊书札五封考释

楼庭坚

摘要：尘封于“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南港档的 HS-NK01-021-001~HS-NK01-021-004、HS-NK05-070-001 计五封信札，展示了胡适与徐复观的晚年交往之秘辛。徐复观向视胡适为一大敌手，不过从书信来看，其心境颇为微妙。二氏正式书信往来，始于胡适秘书胡颂平去函对徐复观《从一个大学校长的角逐看我们的理性良心》一文表示感谢，徐复观复函慰问因病入院的胡适。信函涉及“老子”年代、《醒世姻缘传》作者等问题，从中可窥二氏治学方法同中之异、文化观念根本分歧。

关键词：胡适；徐复观；胡颂平；书札；学术交往

引言

在通常印象里，徐复观也对胡适其人其学有极深的厌恶之情。我们比较熟悉的公案是：1961 年 11 月 6 日，胡适应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¹演讲，重弹东方文明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之旧调。该演讲引发了轩然大波，最严厉的指责正来自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²一文。徐氏声色俱厉，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并称胡适不懂文学、史学、哲学、中国、西方，乃至“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然则二氏之交集并非到此而至。笔者新近在

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档案中，发现徐复观与胡适及胡适秘书胡颂平来往信札五通。这五封未经刊出亦未尝为学人利用的信札，由胡颂平感谢徐复观始，至徐复观慰问胡适终，不仅其事出人意表，可补全徐复观与晚年胡适交往的拼图，亦多涉学术交流，有助于曲尽了解二氏尤其是徐氏学术乃至心理的微妙变化。是故，本文将誊录与标点书札原文，考释书札文字背后之人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秘辛，钩沉历史，以期呈现晚年胡适与徐复观交往之全貌及二氏治学方法、文化观念之分野。³

一

复观先生：

胡适之先生是在二月廿五晚上八点钟进台大医院。第二天（廿六日）早上，他在联

合报上看见先生的《从一个大学校长的角逐看我们的理性良心》一文，他很感谢先生的好意。所以他叫我先写这封信给先生表示感谢。

秘书胡颂平敬上。五十，三，九。

这封信收录于台北南港档，馆藏号为 HS-NK01-021-001。1961 年 2 月 25 日，胡适在南昌街陆军联谊社，因心脏病复发引起冠状动脉栓塞症，呼吸困难，被送至台大医院，直到 4 月 22 日才出院。入院第二天，他读到刊登于 1961 年 2 月 26 日《联合报》的徐复观《从一个大学校长的角逐看我们的理性良心》一文。是文就有人曾不止一次向学生训话“我主张派一架飞机，把讲假民主、假自由的胡适这一般人，空投到大陆去”一事，认为这是出于角逐大学校长的战术，应当彻查，“决不许任何人出卖起码的良心理性的方式，而可以讨得便宜。”⁴

二

颂平先生：

自从知道胡先生病后，我心里非常不安，得来示，至以为慰。附上封问候胡先生的信，敬乞斟酌代为转呈是幸。专颂时绥。

徐复观上。三月十一日。

三

适之先生道席：

您进病院的那一天，我正在台北，几次动念头要到医院来看您，但又怕您听到我的名字不高兴，所以没有来。可是一直到现在，心里头觉得非常难过，我恳切希望您按照医生的意见，静养一个时候，以便来日复原。在您的情形许可下，我即来台北看您。

另有一件事报告给您听，也许使您高兴。我在寒假中写了一篇《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考查》一长文，推翻我过去的看法，回到您的看法上来了。这篇文章虽不敢说对此一

问题提出了一个结论，但把可以运用的材料都运用上，使您的结论很难动摇了。敬请痊安。

后学徐复观敬上。三月十一日。

此二信在胡适纪念馆的馆藏号分别为 HS-NK01-021-002、HS-NK01-021-003。合而观之，从笔迹、称谓、落款之别，益可见徐复观对胡适的恭谨态度。徐氏缘何云“几次动念头要到医院来看您，但又怕您听到我的名字不高兴，所以没有来”呢？这或许可从 1980 年 8 月 17 日《中国时报》的一篇报道找到蛛丝马迹。按徐复观自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后，胡适反应强烈。东海大学为胡适举行欢迎茶会时，“胡先生一进来，顾不得和别人打招呼，就拉着我说：‘今天很对不起，我骂了你们！’‘骂什么呢！’我问。‘今天，我对学生说，唐、牟、徐、张四位所发表的‘宣言’是骗人的，你们不要相信！’‘为什么是骗人的？’‘你们在‘宣言’里提到宋明理学，其实，宋明理学是阳儒阴释。’‘在你反对之前，有没有看过我吗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述？’胡先生说：‘没有。’当时，我就很不客气说道：‘既然没有看过，怎么能批评？’接着又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的，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相关事项亦颇为留心。’‘徐先生是中西兼通啊！’胡先生说。‘这倒不敢。不过，我们确是十分留意西方的文化思想。’就这样，大家谈得很僵。其后，张佛泉先生请吃饭，胡先生在席上请我以后上台北时一定到南港他的宿舍住几天，大家好好谈谈。但以后我未去南港，就再谈过。”⁵

这段话描摹得甚是生动，读者似临其境，胡适讥诮之状，如在眼前。1958 年 5 月 7 日，胡适确曾参加东海大学师生的欢迎会，并在该校图书馆发表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谈话，强调私立学校应有独立精神，不受政治影响。⁶不过胡适未曾在公开场合讨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不曾在明面上与“新儒家”针锋相对。倒是“新

儒家”对以胡适为首的“科学派”的不满之辞俯仰皆是，如熊十力认为“胡适之提倡科学方法，用意固善”，然“学者尚不知涵养敏锐之观察力，不知理道无穷，随在独悟，惟恃吾人活泼无碍之灵感。则虽与之谈科学方法，又恶能运用此方法乎？吾国人早失灵感，急宜有哲学修养以复苏之”⁷。更有甚者，直云“科学派”“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⁸，“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⁹，“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¹⁰。盖胡适、傅斯年一派长期处于学界中心，《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不免呈现一种反抗、叛逆的姿态。实际上，“宣言”为物，大抵具有斗争意味，昨日的“十教授宣言”（1935）如是，今日的“新儒家宣言”亦如是。

徐复观于三十余年后的采访报道中，重忆此事，是否准确还原内情，吾人无从判断——关于“阳儒阴释”之论，胡适对禅宗与理学的确论述颇多，但主要是不满于禅宗过于主观、以超度个人为目的，认为理学较之更进了一步¹¹——可以确定的是，徐复观到了桑榆晚景，仍对胡适有很深的芥蒂，访谈颇具自白意味。在1979年刊于《明报月刊》第14卷第9期《历史的曲折》¹²一文中，徐氏说到蒋介石就胡适提出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长”，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亦语带戏谑。回到1950年代末，徐氏对胡氏的观感，当于敬与不敬两头摇摆之中，故其一面在文章中批评一些五四以来学者，有种反传统心理，“一接触到中国思想史的材料时，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而于不知不觉中，作主观性的恶意解释”（《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1959）¹³；一面这种情感在发与不发之间，故其仍不无示好之心。若徐氏晚年记述无误，则徐复观早时因与胡适当面之不快，兼曾施以笔墨抨击，“心同理同”之下，以为胡适住院，闻自己之名会“不高兴，所以没有来”，便不足为奇了。但对于主动从胡颂平之手传来的胡适谢意，徐复观还是喜出望外，故而去信表示

关切，并不无趋奉之意地提起自己未能亲来探望之缘由。到此刻为止，胡适表态并不多，徐氏对胡氏的意见，则主要属个中滋味的“暗流涌动”。故在胡颂平来信之契机下，他亦想尝试修复他认为的“裂痕”。

四

复观先生：

谢谢先生三月十一日的信。先生给胡适之先生的信，我已念给他过了，他很感激。您的大作《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考查》一文刊出之后，他希望能看看。先生说的“推翻我过去的看法，回到您的看法上来了”，他特别高兴。胡先生在台大医院里疗治了十八天，一切进步很快，再过一个月的静养，便可出院了。他要我先代谢谢先生的关切。

胡颂平敬上。五十，三，十五。

这封信在胡适纪念馆的馆藏号为HS-NK01-021-004，时间为1961年3月15日。结合徐氏来函，可见双方意气平和，乃至在“老子”其人其书问题上相契。此事颇值得留心。如所周知，随着近代诸子学的兴起与现代疑古之风的蔓延，老学在1920年代末后成为显学。当时的聚焦点也不在义理，而是老子何许人也、《老子》何时作也这般较为“外围”的问题。这一经崔浩、叶适、汪中等诸多名家探讨的经典议题，重新焕发生机，而论者俱一时之选。比较闻名的识断有：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持论《老子》在墨子、孟子后（其《中国哲学简史》又以《老子》在惠施、公孙龙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均以《老子》晚于《庄子》。而胡适对“老子”的关注更早。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他便根据《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及《左传》、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作了平实的考证，认为老子先于孔子。¹⁴及诸家论老，胡适乃在《评论近人考

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作出回应。他认为冯友兰提出的“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等证据都存在“丐词”的弊病，亦即将未经证明的结论作为前提条件，梁启超、钱穆、顾颉刚则都有将“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当成证据之问题。在胡适看来：“思想线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¹⁵他以王充无鬼论之后仍有许信鬼论为例，指出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无规律可言，开明之境界可能转而便走向稚嫩。在《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中，他也强调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¹⁶。是故，他表示梁启超、钱穆等需要拿出更精密的方法与更有力的证据，并下了评判：“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¹⁷

1957 年钱穆作《庄老通辨》时，谓庄周为中国道家思想开山宗师，老子承于庄、惠、公孙之说而变，依据则仍在“思想线索”：“然先秦诸家著书，亦有不能确知其书之作者与其著书之年代者，如《易传》、《中庸》，如《老子》，如《庄子》外、杂篇皆是。然其人虽不可知，而其世则约略尚可推。此于考求其书时代之背景之外，复有一法焉，及探寻其书中之思想线索是也。何谓‘思想线索’？每一家之思想，则必前有承而后有继；其所承所继，即其思想线索也。”¹⁸钱氏所强调之“思想线索”，今人或不陌生，盖钱氏高第余英时所倡之“内在理路”（inner logic），实即对乃师说法之发扬。“思想线索”（“内在理路”）假定各家思想，有其中心，其学之承袭流变，非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存一可琢磨之线索。此信念不仅主导了二氏的近世学术史研究，亦令钱氏相信通过考辨先秦诸家之专门学术用法，可明时代。对此，徐复观很快撰文《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读钱宾四先生〈老子书晚出补正〉及〈庄老通辨·自序〉书后》（1957），称现存《老子》一书的思想来自《庄子·天下篇》所称之老聃（非《礼记·曾子问》之老聃），老聃乃“天下篇”作者的前辈，盖在孔子、墨子之后，而《老子》成

书则在《庄子》后，并意有所指地道：“成书的年代，亦并非即是书中内容成立的年代。根据由某书若干词句的时代性，以推断某书成立的年代，固不失为一种考据的方法【按此种方法，我现在看来，也大有问题，此处不详谈。补志】。但若因此而断定其思想成立的年代，则不能不特别谨慎。”¹⁹

立论虽异，在考据的方法论上，应该说徐复观与胡适不无冥契。徐氏所言“历史上常有不俟新材料出现，即只能作大体的判断，而不必故求精密，以免流于穿凿附会，愈求愈远”²⁰，恰为胡适一贯奉行的“一切‘无征则不信’的材料，一概阙疑”²¹准则。两年后，徐氏又云将《老子》置于《庄子》后是一种折衷说法，对旧说进行了“根本纠正”，并在收录新、旧二文的《中国思想史论集》再版时，坦荡地表示：“在《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谈到孔老关系（页九八）的地方，不够确切。此一问题，在拙著《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附录一《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一文中，始有精密的考察，应以之纠正本文的错误。”²²此即徐复观去函所言“推翻我过去的看法，回到您的看法上来了”。在《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中，徐氏仍强调不能根据诸子典籍的某一内容来断定其书思想出于某一时间，“即使顺着思想发展的线索，以论定古书之先后，若仅把握住文化中单线的发展，而不了解我国紧承春秋时代以后的思想动向，并不是单线的发展，则其所谓思想的线索，亦多不可信”²³，可谓与胡适异曲同工；又主要据“精密平正”、作为“治古代思想史最可宝贵的材料”的《庄子》展开考察，认为老子、老聃系一人且为孔子前辈，而《庄子》文字多有对《老子》辞句的发挥，乃至荀子的自然主义亦多老子影响，诸论皆堪称与胡适之论“异代可同调”。

十多年后，当新出土的甲、乙本帛书《老子》的出土为“孔先老后”说提供强力的援驰，徐氏在《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1974）中复说到在诸子学成书年代问题上不可

轻信辨伪新论，“没有经过‘再考证’以前，宁可暂守传统的说法，以免因好奇而陷入泥淖。考古上的新发现，许多是在打轻立新说者的嘴巴”²⁴。实际上，青年胡适已敏锐地注意到这点：“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²⁵这篇“方法书”中徐氏还赞叹了胡适在《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²⁶中谈及的读书应养成勤、慎、谦之习惯，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二氏在治学观念上的相投之处。

五

适之先生：

尊体想必日渐康复，时深忆念！观昨晚上床后翻阅《越缦堂读书记》（系由其日记中所抄出）九二五页有这样一条：

“无俚，阅小说演义名《醒世姻缘传》²⁷，书百卷，乃蒲松龄所作，老成细密，亦此道中之近理可观者。咸丰庚申二月十六日。”

这条材料好像先生不曾提到。谨抄录或可供一快也。观涉讼事，听其自然，凡由良心所发之文字，即应有负责到底之勇气。故对方所提之调解条件，观当即拒之矣。

后学徐复观敬上。五月十八日晨六时。

这封在胡适纪念馆馆藏号为 HS-NK05-070-001 的信札涉及了二事。徐氏首先在慰问胡氏病情后，抄录了《越缦堂读书记》中一条关于《醒世姻缘传》为蒲松龄所作的材料。对于《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何许人也，胡适曾颇倾注一番心血，特六七年搜求之功，而成《〈醒世姻缘传〉考证》（1932）。作为“科学派”“祭酒”，胡适向有“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²⁸之自觉，而小说研究正是其“试金”的主要“演练场”。其《〈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皆有方法的直接指引，而要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教科书”，当属从行文布局上即尝试金针度人，列明解答问题之次序，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²⁹

的，唯其《〈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他严格按杜威“五步法”，首先找到并指出疑难境地——《醒世姻缘传》之作者何许人也从卷首与弁语无从直接下手，然书中屡次提到杨梅疮、《水浒传》与《西游记》，又与《聊斋志异·江城》同述两世恶姻缘，故作者可能是《聊斋》作者蒲松龄。他随后开始寻找解决疑难之方法，提出若干内证：二书同注重夫妻问题尤其是对悍妇的描写；《聊斋》悍妇似是《醒世姻缘》悍妇的草稿子。此后，邓之诚《骨董琐记》所述鲍廷博言蒲松龄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及孙楷第通过将《醒世姻缘》所记地理与济南府属各县地方志比较得出的《醒世姻缘》作者为蒲松龄抑或明清间章邱、淄川人的结论，令胡适更为自信。他最后开展“五步法”最后一步“进一步的观察与试验”，根据《醒世姻缘》与——胡适：《醒世姻缘》第 90 回所写灾情与《聊斋文集·纪灾前》相近、《聊斋白话韵文》证明蒲松龄可以写很好的白话鼓词、《聊斋》与《醒世姻缘》的土话的用法与字句非常一致，认定《醒世姻缘》的作者为蒲松龄。

徐氏去函为作为胡适的思想方法“实例”之作添砖加瓦——即便这条材料及胡适之说尚不够有力，³⁰亦见徐氏有意建构学谊。至于其后其言涉及讼争并将对良心所发文字负责到底，则当属其肺腑之言。此后在《立言的态度问题》（1961）³¹中，他也说到“良心的可靠性，即是人类尊严、人类前途的保证。所以良心之所安，良心之所不安，是负有立言责任的人，首先应向自己提出的反省”。

余论

不出数月，我们所熟悉的事情便发生了。《文星》陆续推出居浩然的《徐复观的故事》³²与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³³，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胡适宣读《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引得《征信新闻》《中外建设》《学粹》《政治评论》《人生》等刊的批评文章纷至沓来。胡适虽让胡颂平搜集相关文章，称看了也不生气，但还是在 11 月 26 日因“胸部很闷，气也喘起来，咳嗽时痰中有血

丝”³⁴，再度住进台大医院。从此后胡颂平与萧孟能等的信函可知，胡适并未读过徐复观的“檄文”，但其私下谈起徐复观时，并无好言。1962 年 1 月 5 日胡颂平记述道：“先生谈起：‘（空三格）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他来时你不见，可能得罪他。所以他来了，我特地想些话给他谈，不给他多谈几句，他不过瘾的。’”³⁵并特地附上徐文。此语当是胡氏对徐氏的真实看法。考虑到徐氏际遇特殊，是半路出家，不比胡适年少成名，故若说其有一定“不安全感”，非无可能。其特望获得同治思想史而取径不同的胡适之认同，亦在情理之中。

两天后，文星书店社长萧孟能与陈立峯、胡汝森致函胡适（胡适纪念馆馆藏号：HS-NK05-131-008），称对《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能发表于《文星》感到骄傲，并希望胡适对徐复观的攻击作出回应：“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第十二卷二十四期民主评论上发表一篇‘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都是攻讦您那篇讲词的，而且措词相当缺乏理性，您或者都已经看过了。以您的大度，相信会一笑置之的，不过，社会上的观念，可能因为他们的言论而搅得混淆不清。他们抓住了您的某些论点，对您作人身攻击。……因此，我们很希望您能够正面地提出答辩。”此信经徐高阮转交至胡适，1 月 13 日胡颂平代复道“胡先生说他现在不想写什么文字，医生也不许他写，将来就是看了廖维藩、徐复观的文章，也不会写什么答辩的文字了。胡先生要我谢谢你们的好意”（胡适纪念馆馆藏号 HS-NK05-131-009）。2 月 1 日，《文星》声明欢迎在文化论战中，“把《文星》这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³⁶。但胡适既无此意，他的身体也无法支持他作文章。1962 年 2 月 24 日，72 岁的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酒会，说道：“25 分钟的话，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对我进行文字围剿。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我挨了 40 年骂，

从来也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未毕，突然倒地，于当晚 7 点 10 分与世长辞。

徐复观在广播中闻此噩耗，“数月来与他在文化上的争论，立刻转变为无限哀悼之情”，急将已交给《文星》的牵涉胡适的论战文章收回，并发表《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³⁷，称：“胡先生二十多岁，已负天下大名。尔后四十多年，始终维持他的清望于不坠。今日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死于其位，也算死得其所。可以说，他是这一时代中最幸运的书生。但是从某一方面说，他依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书生。正因为他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怀疑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其实，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把自由民主的问题，能放在一旁，甘心不闻不问，而只以与世无争的态度来讲自己的学问，这种知识分子，他缺少了起码的理性良心；他所讲的学，只能称之为伪学，或者是一钱不值的之学；在这一点上，胡先生会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然，这种意思，越是对他亲近的朋友，越是无法讲出；真正讲出，表面的热闹，也不能变持了。他之所以依然是一个悲剧的伟大书生，原因正在于此。假使他死而有知，会和活在的人是同样饮恨的。”

这段浇自身垒快的话颇堪体会。在治学上，徐、胡二氏终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徐复观非常警惕谈中国文化问题者“忽视文化性格上的不同，而仅拿同一的尺度去夸张附会。凡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是拿西方的文化做尺度来量中国的文化”³⁸的做法，并说到任何文化各有其不足，只是吾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专从缺点和流弊的方面去看”³⁹。这也是钱穆致徐复观的信札中斥胡适处：“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⁴⁰但在对民主的追求上，徐、胡又可谓遥相呼应，同气连声。

一如陈寅恪在观堂碑所言“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

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⁴¹，徐复观对胡适亦作如是观——在学术的具体观点与研究方法上，徐氏对胡氏多有微词，尤其是不认同胡氏以现代性的标准审视传统，又于考据外不重义理。在他看来，考据与义理实难分离，思想固然需通过考证确定，“考证中的判断，也常要凭思想的把握而始能确定”⁴²。而想要梳理中国哲学著作中以潜伏状态存在的结构，更需“加上一种‘解释’的工夫”⁴³。但是在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上，徐氏对胡氏颇为同情理解，乃至引为同好。故而胡适作古，徐复观对这位“悲剧的伟大书生”，终于迸发出一种“吾意独怜才”的情感。⁴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¹ 请参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载1961年12月台湾《文星》第50期。

² 请参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1961年12月台湾《民主评论》12卷24期。

³ 收录于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3年）的黎汉基《徐复观与胡适》一文曾简单地胡适与徐复观的三次论证，其中谈1954年徐复观与胡适对吴稚晖的不同评价部分颇有新见。

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3529页。

⁵ 徐复观：《擎起这把香火——当代思想的俯视》，《徐复观全集》第16卷《论文化》（二），第850—851页。

⁶ 请参胡适：《谈谈大学》，载1958年5月台湾《东海大学校刊》第13期。

⁷ 熊十力：《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熊十力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3页。

⁸ 钱穆：《引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册《国史大纲》（上），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⁹ 钱穆：《自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6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第18页。

¹⁰ 钱穆：《学术与心术》，《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学箴》，第161页。

¹¹ 胡适：《中国禅学的发展》，（日）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458—521页。关于此胡适先生的禅宗史研究及其旨趣问题，请参楼庭坚：《人本主义与理性传统的重昌——从胡适的禅史书写看其论学旨趣》，《鹅湖月刊》（待刊）。

¹² 徐复观：《历史的曲折》，《徐复观全集》第24卷《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第172—173页。

¹³ 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徐复

观全集》第14卷《论知识分子》，第99页。

¹⁴ 请参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4—236页。

¹⁵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全集》第4卷，第119页。

¹⁶ 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胡适全集》第4卷，第140页。

¹⁷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全集》第4卷，第139页。

¹⁸ 钱穆：《自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7册《庄老通辨》，第13页。

¹⁹ 徐复观：《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读钱宾四先生〈老子书晚出补正〉及〈庄老通辨·自序〉书后》，《徐复观全集》第3卷《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09页。

²⁰ 同上注，第105页。

²¹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胡适全集》第5卷，第215页。

²² 徐复观：《再版序》，《徐复观全集》第3卷《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4页。

²³ 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徐复观全集》第12卷《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53页。

²⁴ 徐复观：《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徐复观全集》第17卷《青年与教育》，第209页。

²⁵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论》，《胡适全集》第5卷，第214页。

²⁶ 请参胡适：《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载1935年《大学新闻（北平）》第3卷第11期。

²⁷ 原作“《醒世姻缘》者”，见【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本社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873页。

²⁸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73页。

²⁹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全集》第4卷，第353页。

³⁰ 如蔡九迪（Judith Zeitlin）驳斥悍妇之说，以此形象在17世纪广泛存在。见【美】蔡九迪著，任增强译，陈嘉艺审校：《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另，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考辨《醒世姻缘传》作者甚详，见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³¹ 徐复观：《立言的态度问题》，载1961年5月台湾《民主评论》第12卷第12期。

³² 居浩然：《徐复观的故事》载，1961年10月台湾《文星》第48期。

³³ 李敖：《老年人与棒子》，载1961年11月台湾《文星》第49期。

³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249页。

³⁵ 同上注，第284页。

³⁶ 《编辑室报告》，载1962年2月台湾《文星》第52期。

³⁷ 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载1962年3月台湾《文星》第53期。

³⁸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徐复观全集》第 13 卷《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第 11—12 页。

³⁹ 同上书，第 9 页。

⁴⁰ 钱穆：《致徐复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53 册，第 322 页。

⁴¹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6 页。

⁴² 徐复观：《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

《徐复观全集》第 17 卷《青年与教育》，第 207 页。

⁴³ 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徐复观全集》第 14 卷《论知识分子》，第 93 页。

⁴⁴ 朱学勤曾谓：“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正常关系延续了近百年，至殷海光晚年在病榻上与徐复观接近言和，方出现一线转机。”见朱学勤：《1998 年关于：陈寅恪 顾准 王小波》，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 年 1 月 5 日。如今看来，这个时间点还可提前。

胡适“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

肖伊绯

◎《中国季刊》上的胡适讲演“佚文”

九十九年前，时为 1925 年 10 月，著名学者胡适继上个月在武昌讲学之后，又赴上海各大高校讲学。10 月 27 日这一天，胡适来到早年就读的母校中国公学做了一次学术讲演，题为《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一个多月之后，12 月 1 日，由中国公学出版部杂志股负责编辑的《中国季刊》，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就将胡适此次回归母校所作讲演的内容刊发了出来。

据笔者查证，《胡适全集》第 6—9 卷（哲学·专著·论集·宗教）中，没有收入此次讲演内容。因此，《中国季刊》所刊内容，应为“集外文”，或亦可称之为“佚文”，作为基础文献“补全”之价值，自不待言。为公开披露与共享这一稀见文献，也为后文便于据之略加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刊载原文如下：

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

胡适之 讲

张师竹 记

十月廿七日讲

欲明中国哲学之源流，当先一述西洋哲学之观点。按西洋哲学之观点，以杜威博士之说，最能涵盖一切，以其不仅可以说明西方哲学，

即东方哲学之来源与变迁，亦可依其所说加以解释。兹先将杜威博士之观点，分作四层讲讲。

（一）哲学之原料 要知哲学之出身原极低微，其所据者不外乎传统的思想如迷信、风俗及民间之歌谣等等。

（二）传统的思想必经过整齐统一的阶级。先民时代所遗之思想，率係杂乱无章，故必经系统化而后可以成为哲学。例如以前之神话成为后来之历史，以前之歌谣成为后日之诗歌，以前之迷信成为后来之宗教等是。

（三）传统的思想与后来之常识相冲突。人之常识与时俱进，于是觉得以前之传统的信仰为不可信。既有所怀疑，则冲突生焉。冲突、革命，俱属破坏也，然而正统哲学之起即种因，于是破坏正未可以轻视也。

（四）正统哲学之起。前有传统思想，后有激烈思想，两不相容，而调和者出。新旧之调和，是即正统哲学之成立，其调和也用旧思想为基础，以建设新智识于其上，是乃取旧思想之菁英而加以理想的解释：所谓旧思想之“理想化”与“理想化”者是也。

吾人既略窥杜威博士哲学之观点，可即持此以衡（量）中国哲学之源流。

（一）中国哲学之原料，其原料不外乎几种经典，如《诗》《书》《易》《礼》《春秋》者是也。此种经典乃根于先民之歌谣，先民之历史与先民之迷信，而远在孔子之前。

（二）整齐统一之阶级。上述之传统的思想，其所以能成为经典，当然亦非一蹴而几（就）。其间实经有若干时之整齐与统一。例如古时临阵、婚嫁之必待于卜，则足证已成为经典矣。

（三）对于经典之怀疑及破坏。例如先民之信仰，谓天有意志与喜怒哀乐，并信有鬼。此种信仰相传至某时期，便有人起而怀疑，起而破坏。老子实为革命之健将，渠力反前人之说，不主敬天明鬼，而谓天地以万物为刍狗。邓析亦曰天之于人无厚也。之二人者，皆为极端之破坏者。若以今名称之，则老子或可称为思想上过激派，以其惟仅有破坏，反对一切传统思想，于是有孔子出而调和以造成正统哲学。

（四）中国之正统哲学。

（甲）孔子 孔子虽亦不信鬼神，然其主张不若老子之过激。故曰祭神如神在，所谓“如”者即德文中之 als ob 或英文中之 as if 也。又如《礼记》中之“斋戒”，亦足以代表其调和式之思想。他如问鬼正名诸章，亦复如是。总之，孔子完全将古代信仰加以理性化。

（乙）墨子 孔子虽然以调和自处，然而时人犹有目之为激烈派者，于是有反动派之墨子。墨子之说实最守旧（此层乃胡先生治墨学而新有所得者。）渠尝指斥孔子有不能敬天明鬼等四大罪，故以今名称之，则正统哲

学中孔子为左派，而墨子为右派。

（丙）汉代阳儒阴墨之哲学 墨学实能传后而最盛于汉。汉之董仲舒，阳虽称为儒家，而阴实为墨学张目。当时之基本观念，即人做事能感动有意志及有智识之天。《春秋繁露》及《汉书》即具有此基本观念是也。“天人相与”实成为中古时代之哲学。迨王充起而大倡革命，渠以“疾虚妄”相标榜，力求打破一切迷信而主张恢复昔日之自然哲学。

（丁）道教之起 墨家至此，知儒家之名已不必冒袭，于是一变而为道教。

（戊）佛家之继起 以上云云，乃一千年前之正统哲学。其后佛家继起，其势力之盛，几历八百载之久。然佛家为外来之思想，怀国家主义者，遂力攻佛教，而打破一切迷信。

（己）宋儒之调和论。破坏佛教之说盛，而宋儒之调和，若辈以佛家之眼光，重读中国古书，觉得尽可仿造外货。宋儒遂将儒释道三教，冶为一炉，采众说之长，而使其固之思想，得以保存。一方根据经典，一方则采用科学（致知格物）；一方讲道说理，而一方仍讲宗教。涵养是“敬”，“致知”是理，是乃用中国之菁英，以补佛道之不足。故中国之正统哲学亦负有一使命，即保存中国传统思想上固有之价值，调和者亦有绝大之贡献也。

上述近一千五百字的讲演内容，记录者署名为“张师竹”。张氏之名，早在 1924 年就见诸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英文杂志》之上；张氏乃是《苏格拉底自辩文》的中译者，这一译本在杂志上连载数期，在读者群体中应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也由此可见，张氏不但英文熟稔，已可胜任翻译国外著述，应当还对西洋哲学及其学说有一定研究。后来张氏所译波比忒所著现代教育名著《课程》（1928 年 12 月初版），张东荪初译，复交由张氏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1933 年 3 月初版），以及张氏所译罗素名著《社会改造的原

理》，托马斯·潘恩名著《理性时代》（俱为 1959 年初版）等等，都足可见其人在西洋哲学方面的认知与修养。因此，张氏所记录的此次胡适讲演，应当是其人较为熟悉也有着相当兴趣的，记录下来的讲演内容，也应当是有着较为准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季刊》上的胡适讲演记录稿至可宝贵，可还并不是此次胡适讲演的最早披露者。事实上，早在此次讲演两天之后，即 1925 年 10 月 29 日，上海《时事新报》即已报道并刊发了此次讲演内容。经笔者核对，《时事新报》所刊讲演内容与《中国季刊》所刊完全一致，只是没有注明记录者姓名。不过，报道首段对此次讲演的一些基本信息，有一番简明扼要的交待，恰恰又可弥补《中国季刊》所刊仅为讲演内容记录之不足。且看报道首段原文如下：

“本月二十七日，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欢迎校友胡适之博士到校，并请其在礼堂讲演，讲题为‘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由张东荪先生主席。”

◎胡适此次讲演的历史及学术背景

此次讲演题目《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可谓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就是要现场为中国公学的在座师生讲解中国哲学之源流，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立场、宗旨及主张。而达成这一讲解的前提，也即胡适相关观点的形成之前提，乃是基于其美国导师、著名学者杜威的观点，并以之为“方法论”来剖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

应当说，这样的“方法论”，看似新颖时尚，可只要是对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国内早已流行“洋为中用”乃至“中体西用”风尚略有体察者，对于胡适这样讲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应该感到并不陌生。不难发现，此次讲演无非就是那一部六年前初版的，即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2 月初版的，令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作者现场概述罢了。言及于此，就

已然涉及到胡适此次讲演的历史及学术背景的问题了，在此也就有必要约略做一番梳理与表述了。

遥思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西风东渐”是作为殖民地化的一个后果长期存在的，“洋为中用”则是被迫的，乃是不得不推行所谓“变法图强”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势之下，西方学术的引进、推介、运用，直至信服、推崇、崇拜，乃至承认中国文明的落后与倡导“全盘西化”，对那个时代任何一位中国学者而言，都将有一个相当痛苦乃至痛定思痛的转变过程。当时的“新青年”胡适，无疑正是这一场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蝶变”过程中的佼佼者，在对西方哲学观念、理念、概念的引进与推介中倾尽全力，并且将“哲学”概念纳入到中国思想史中进行比较研究，较早提出了“中国哲学”这一学术概念。

应当说，胡适这样做的本意，乃是要让当时的中国学术尽快摆脱“前现代化”的被动局面，这样的做法本身也确有“标新立异”“拔苗助长”的某种仓促与草率；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做法也是力图将中国思想的精华部分包装成一种“国际学术”，使中国学术迅速完成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并在西方学术界尽快获取其合法性与话语权。胡适的“开风气之先”，效果是显著的，影响是空前的——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民国八年（1919 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以来，迅即风行海内，至 1949 年之前先后再版新版达 20 余次之多（几乎每年都有一个版次印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更为青年学子们所推崇。

一般而言，后世读者与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是胡适学术生涯中的“定海神针”，是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开山之作”。遗憾的是，这也是其终生未竟之作，卷上出版之后，原计划撰写的卷中、卷下始终未能完成。虽然存世尚有卷中部分的北大讲义本，以及部分涉及卷中、卷下内容的手稿残本；但当年这些著述毕竟均未能公开出版，都还是停留在讲义或手稿层面的“半成品”。

(注:十年前,笔者有幸在日本寻获《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并将此著卷上卷中两个部分内容重新整合校订,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胡适此次讲演所体现的学术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讲演中言及中国古代所谓“正统哲学”时,似乎已然明确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及卷下的编撰策略,即始终以所谓“正统哲学”,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的“主流价值观”为主线,续谈“道教、佛家之继起”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再谈自“宋儒之调和论”以来的中国近世哲学史。

事实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凡例”中,就曾经提到过胡适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下三卷的预期与展望。他写道:

本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这个区分,似乎不平均。但这里面有两层理由。第一,古代哲学书有许多话须详细解释,故校勘、训诂两项占了许多篇幅。中古以下的书籍,不用做这几项工夫,故篇幅少些。第二,古代哲学的规模广大、问题繁杂、学派众多,故须多占篇幅。中古哲学材料较少些。近世哲学材料虽多,问题实很简单,派别也很少,故不须一一细述了。

在胡适的《中国中古哲学史泛论》手稿中,还可以看到,“中古”与“近世”的时间段区分,无论其区分理由与方式,都有了“雏形”,但还颇感勉强和不满意。文中坦承:

自汉兴到北宋初年,约自西历纪元前二〇〇年,至纪元后一〇〇〇年,这一千二百年的时期,我们叫他做“中古哲学”的时代。这种区分,天然是很勉强的,因为我们并没

有确定的标准可用来把“中古”与“近世”分作两个绝不相同的时期。

胡适认为,所谓“历史分期”,不过是一种学术方法上的方便罢了,无论哪一种区分理由与方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面面俱到。换句话说,为编撰一部学术通史,而随之实施的中国历史分期,其随意性与主观性同在,其便利性与矛盾性同在。胡适在编撰“中古”哲学史时,就已经不可避免的触及到“近世”哲学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他曾经为“中古”时代做了三种分期法,其实也就同时规划出了“近世”时代的三种分期法。他列举如下:

第一法:(1)自汉初至隋为中古,约自纪元前二〇〇年至纪元六〇〇年;(2)自隋唐至清末为近世;约自六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

第二法:(1)自汉初至明末清初,约纪元前二〇〇年,至纪元一六四四年,共一千八百多年,为中古时期;(2)自清初至现在,自顾炎武、黄仲羲等到孙诒让、章炳麟,为近世时期。

第三法:(1)自汉初至北宋为中古时期;(2)自北宋至现在,约自西历一〇〇〇至一九〇〇为近世时期。

虽然,胡适最终基本选择了“第三法”,并且在“中古哲学史”及后来的“中古思想史”撰述中,都基本贯彻了这一法则;但可以看到,这三种分期法,对其治学的影响也是利弊参半的。正是因为选用“第三法”,《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编撰,即“中古哲学史”及后来的“中古思想史”的研究计划,最终都未能全部完成。

在这一“历史分期法”中,虽然涉及汉代哲学史的部分没有疑义,但宋代部分的内容究竟是应放在“中古”还是“近世”,胡适始终还是犹豫不定,时有动摇的。实际上,胡适的中国“近世

哲学史”，在 1921—1922 年曾形成过部分讲义；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处，也有过两个学期的授课。据《胡适日记》载，1921 年 10 月 21 日，胡适授课为“近世哲学史（2）讲近世哲学背景（一）”——这是《胡适日记》中明确提到“近世哲学史”的首次记录。虽然日记中没有记录课程的具体内容，但在 10 月 25 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近世哲学讲背景（二）王安石的变法”的内容。于此可以推测，胡适的“近世哲学史”是至迟应是从北宋初期开讲的。

胡适的另一份未刊手稿“近世哲学”（详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7 册），也可映证这样的推测。这一手稿，可以看作是胡适撰述“近世哲学史”之前的一种“历史分期预设”与“史料清单”，但并不完备。手稿中列有“时代”与“背景”两个大项——“时代”项为 989—1036 年，从“陈搏死，范仲淹生”到“苏轼生”为止；“背景”项则又列有 6 个分项，分别为“承平之久”、“承平的隐患——不甘苟安”、“佛教之盛——太宗、真宗的提倡”、“道教之盛——真宗之提倡《天书》之事”、“佛学之盛”、“道学之盛”。显然，上述这些内容，全部都是“北宋哲学史”。

概观上述这么一段胡适尝试编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卷下的历程，可以从中体味到《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讲演的重要性所在。可以说，此次讲演乃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胡适试图续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种种思考，当时已逐渐形成了某种可以付诸实践的学术策略了。

◎胡适此次讲演中的一些“特异”之处

为了尽快确立《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卷下的编撰思路，胡适凭借所谓“正统哲学”这一主线，条分缕析、左右腾挪，似乎已然可以续完这部曾令其“暴得大名”，各界读者又多有期待的学术名著了。不过，诚如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凡例”中所言，由于“中古哲学材料较少些”，卷中的编撰，一时还并能如卷上那样游刃有余，立竿见影。

不过，此次《谈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讲演中，出现了一些在当时乃至如今的学术界里都可称“特异”的观点，或可视为胡适为编撰卷中所特意开创出来的一些思路。

譬如，“汉代阳儒阴墨之哲学”之说，就颇为“特异”。这是将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倡举，予以了重新认知与解释。胡适认为，此举表面上是推崇儒家学说，实际上却是为了让墨子学说渗透至“正统哲学”体系。如此“特异”的解释之下，复又为后来王充“起而大倡革命”，“力求打破一切迷信而主张恢复昔日之自然哲学”，埋下了伏笔。这样一来，早年对“墨学”有过较为充分研究，且对王充所著《论衡》及其学说抱有浓厚兴趣的胡适，在编撰卷中时所面临的“中古哲学材料较少些”之状况，随之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再如，“道家之起”竟然是由墨家转变而来的，这样的观点与解说，姑且不论是否合乎历史实情，却也着实有效的拓延了中古哲学史的史料整合途径。至于谈到“以上云云，乃一千年前之正统哲学”，意即大约北宋（960—1127）之前，中国尚存在没有外来思想涉入的所谓“正统哲学”，这样的说法也有些“特异”。须知，佛教早在东汉（25—220）时期即已传入中国，南北朝（420—589）时期已然大为流行，佛教教义及其宗教思想，至迟在那时即已广为传播，对中国社会有着极其充分且深远的影响。当时，这一影响应当已然涉入并深入到了所谓“正统哲学”之中，至于何时如何涉入，有着怎样的深入影响，需要十分缜密且严谨的专题探研，并不是简单的一句“以上云云，乃 XX 年前之正统哲学”可以随意裁定的。显然，如果现场记录无误，胡适讲演中那一句“以上云云，乃一千年前之正统哲学”，有失偏颇，有些草率了。

紧接着，胡适谈“佛家之继起”时，又称“其势力之盛，几历八百载之久”，这个“八百载”的断言，也令人感到“特异”。若以佛教自东汉时传入算起，这个“八百载”，即是指自东汉至唐宋时

期，难道元、明、清三代，佛教势力即不够兴盛了？或许，胡适此处的断言，乃是指佛教思想开始涉入与逐渐深入到所谓“正统哲学”之中的大致年代区间，意即自东汉至唐宋时期，乃是作为“外来之思想”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正统哲学”

的互动融合之兴盛期。若仅以“势力”论，而不确指“思想”，则似乎还有些笼统，不够确切了。

（作者现居成都，胡适研究者）

胡适先生与北京西山

李新风

北京西山群峰叠翠、四时俱胜，数百年来拱卫着京城也映射着它的世变荣衰。民国建立以后，昔日封闭的帝王宫苑对大众开放，平民百姓得以观览。丰富的历史文化，优美环境对知识阶层尤富吸引力，西山成为他们寻古探幽，舒怀解困，读书交友的世外桃源。去西山养病、游玩的记录在民国文人的著述中屡见不鲜。随着大学生人数增加，北京大学甚至有过迁往西山的规划。¹

胡适 1917 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前后在京居住了 18 年（1917. 8—1926. 7, 1930. 10—1937. 7, 1946. 7—1948. 12）。居京期间的郊游主要是游览西山。见诸记录的有 31 次，其中 22 次在《胡适日记全集》中有详细的记录，另外几次可以从他后来日记中的追述或其它材料里推断出来。

胡适最早游西山的记录不见于日记，而是在 1918 年 9 月 14 日他致母亲的信：

我国今年以来，不有一天休息，故觉得精神有点疲倦。现定明日出京，到京城西边的西山去养息七八天。那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好，可以每天上山去玩玩，也不会客，也不办事，也不操心。养了几天回来，定然身体更好了，精神也更好了。²

9 月 17 日胡适去西山住了五天，天天爬山，面色晒黑，精神大好。

西山行中的公务

胡适去西山并非完全是游山赏景，出于公务的占了三分之一。可见当年西山一带政治文化活动颇多。未见胡适本人记录的 5 次西山之旅也在此列。

1920. 3. 14 日记：青年会会齐，赴西山开讨论会。

《北京大学日刊》1920 年 3 月 17 日有《中外教育家近事》一文报道：

3 月 14 日燕京大学教授博晨光（Porter）等及清华学校一些教授公宴蔡先生及胡适之、蒋梦麟、李守常诸先生，座中谈及文化运动与基督教双方之意见，蔡、胡、蒋诸先生对于宗教哲学颇多深沉之发挥，而协和大学教员 Zuger 先生尤能揭破一切宗教内幕云。

会上讨论了北京大学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在北京的基督教开明人士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燕京大学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做出必要的改革。以后几年里，随着社会思想文化变化，1922 年燕京大学取消了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1925 年将宗教课改为选修课。也正是在这次会上，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在卧佛寺留下了珍贵

合影。

1920. 9. 16 日记：

慈幼院执事人请吃饭（我是慈幼院评议员之一）。

这次邀宴距 1920 年 10 月 3 日香山慈幼院的开院典礼只有十几天，慈幼院院方应有正式邀请胡适出席。几天后，香山慈幼院校刊编辑、北大预科工读学生党家斌又函催胡适上山：

前次我同先生打电话，先生说要到西山来，我狠希望先生快点来。这几天山上略有点雨，树木异常的绿，空气异常之爽，来来往往又都是些可爱的小学生。我觉得我近来把少年的精神差不多失去了，可是这几天使我异常快活，我觉得这是我光复的日子了。如果先生能在一两天内就来最好，我狠愿意陪着先生游游山，先生以为如何？在十月三号慈院开学以前我还愿同先生面谈几件事的。³

函中“前次我同先生打电话，先生说要到西山来”，说明胡适已有去香山的计划。身为教育家、慈幼院评议员，胡适到会祝贺可以无疑。

1921. 10. 9 日记：与文伯、擘黄、叔永、莎菲游八大处秘魔崖后至香山慈幼院开周年纪念会，有讲演。

1921. 10. 29 日记：到香山。今天中美协进社开会欢迎美公使，熊秉三先生为主人，请他一家吃饭。恰好有旧金山商会游历团男女四十余人昨日过北京，美使馆参赞安立德君邀他们加入。饭后，他们参观慈幼院。……我与经农在香山住了一晚，今日玩碧云寺，甚乐。

胡适同期庚款留学的好友张彭春 1924 年 2 月 17 日日记：

.....

昨天，西山饭店，聚餐会。

大谈戏剧。

.....

适之作词选，我说要同他学作词，他说，读他的词选，熟读二、三百篇，自然会作了。是非背诵不可的。⁴

当年的西山饭店位于西山八大处，胡适和朋友游西山时多次在此休息用餐。张彭春时任清华教务长，对胡适倡导新诗和新月社的活动都很热心。“新月社”的名字就是张彭春推荐给朋友们的。张彭春日记里多次提到新月社聚餐会，聚餐会时间地点并不确定，大约每月一次。成员多是以徐志摩为中心聚合起来的，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是主要成员。

1926 年 6 月 3 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干事凌冰致函胡适：

昨日下午与范源濂（静生）商量中基会（China Foundation）请客事，范感为难，最后决定由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教育改进社、香山慈幼院三团体名义请庚款调查团全体并威林顿夫人到香山一游，时间由胡适同其余人酌定，以下星期二（6 月 15 日）为佳。⁵

从 1921 年起，胡适就参与了中英民间对英国庚款的退还交涉，是“庚款调查团”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个代表之一（另两人为丁文江、王景春）。1926 年 3 月，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英方委员访华，坚持保留查核庚款账目权力，国内教育界各方主张不一，矛盾重重。随后，英国庚款咨询委员“苏狄尔教授留在北京，七月里在哈尔滨和胡适会齐，同搭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开会。”⁶胡适八月抵英。通过中方代表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既英庚款董事会由中国政府任命；有处理庚款全权；庚款将用于农业教育及改进、科学研究、

医学与公共卫生以及其他教育事业。

凌冰是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又有范源濂校长委托，身处此事中心的胡适利用陪游香山的机会接触、了解各方意见是非常合理的。

1930 年夏天，胡适、翁文灏、丁文江会同外国友人专程去西山参观地质调查所新成立的“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这是继 1929 年 12 月主持发掘并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之后，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新成就，中国现代地质科学事业就此开始。1913 年 10 月，由丁文江创办的地质调查所，是当时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科学研究机构，蔡元培先生称赞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胡适、翁文灏、丁文江、谭锡畴等人有此行的纪念合照。⁷

1930.10.15 日记：与叔永去香山同赴熊秉三先生约。

1934.1.2 日记：陪张蜀川、章希吕、胡铁严游西山秘魔崖，……路上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大钊）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在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

胡适特意去凭吊李大钊并嘱托蒋梦麟为其立碑，足见他对这位北大亡友的深情。

1934 年 4 月 5 日晚，胡适去西山卧佛寺夏令会作《青年的出路》演讲。8 演讲的内容是毕业生如何进入社会。其中的几句话放在不同的时代都同样适用：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的社会是在找人。你有成绩请拿出来，自己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有好成绩呢，是不是够社会用我的标准呢。

讲演后，胡适主持讨论并回答青年提问。是夜留宿卧佛寺。

1935 年 7 月 14 日记：

与香港大学文学院长 Robertson、Major Rupel、受颐、许地山、陆侃如夫妇、毛子水及冬秀同游西山。九点出门，七点归，作竟日之游。

港大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请陆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与陈受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

1933 年，香港大学仰慕北方教育改革的成绩，请胡适推荐一位精通国学之人为该校中文系主任。胡适首先想到的陈受颐因种种原因未接受聘任。1935 年 1 月胡适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颁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港大期间，他对中文系课程的批评促成校方急欲改革中文教育的决心，最后校方接受胡适推荐，于该年七月聘请燕京大学许地山教授负责领导和策划学系的课程改革。此游还引起了新闻界关注，《北洋画报》以“胡适之夫妇在平招待友人游香山”为题刊发了图片报道。⁹

补记的西山之行

细读《胡适日记》发现，除了当天记录的 22 次西山行之外，有 4 次没有记入日记，除了 1918 年 9 月 14 日他致母亲的信中说到的那次之外，在日记追述和书信中可知还有 3 次西山之行。

1921.6.5 日记：是夜杜威先生自西山回来，我托他转告美国各医院请他们去首善医院设法把夷初移出来。他答应去办。

1921.6.10 日又记：梦麟邀我与文伯同去西山游一次。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今天我们同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坐谈三个多钟头，也可算是偷闲寻快活了。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就在 6 月 3 日，北京大学等八所国立高校索

薪委员会赴总统府要求发放欠薪，在新华门遭军警殴打，酿成了“新华门事件”。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处在风口浪尖，自然“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胡适原拟去保定的讲演也临时取消。显然，他们这次不太可能陪杜威出游。但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回忆到：

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蜣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蜣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蜣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¹⁰

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曾问胡先生此事，胡适说：“《西潮》是蒋梦麟先生的自传，他的自传部分写的太少，议论写的太多。他年纪大了，有些事记错了。”¹¹

但蒋梦麟这一处回忆，细节生动，对话活灵活现，可信度较高。陶孟和也有函回答胡适：

久不通信为念。想你身体渐好。有一次在西山你看见推粪球的小黑动物，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虽然知道他的俗名，但是不知如何写法。昨偶读王定保的《唐摭言》，……所说的蜣螂，正是那个小动物。我们俗话称他为“屎蜣螂”。¹²

另据《杜威在华学谱》记载，杜威 1919 年 5 月 29 日下午到京，5 月 31 日、7 月 7 日就两次去

西山游览。¹³胡适、蒋梦麟陪同游过西山应该是确定的。

1930. 10. 20 日记：去看朱我农夫妇。并见其母。问知毅农现另住一小屋，用一个老妈看护，现卧病在床。朱母已八十余。殷殷要我安慰她。……她病在床上，我进去看她，我农夫人即辞去。我自去年二月香山见她之后，至今始见她。她很瘦削，对我说话很清楚，但也未免有风话。……此会甚惨，使我很感动。

回看 1929. 2. 25 的日记：

我一月十九日到北京，今日出京，在京住了三十六天，……见了无数熟人。此行有许多可以纪念的事，可惜太忙，日记不能继续，这两个月的日记遂成最残缺的日记。

“我自去年二月香山见她之后，至今始见她”，说的是朱毅农。其兄朱经农和胡适、饶毓泰是中国公学同学，胡适因在新公学教英文又成了饶毓泰的老师。朱经农敬佩饶毓泰的人品与学识，便把妹妹朱毅农介绍给了饶毓泰，但两人婚后并不幸福。胡适写这则日记时，两人已经离婚，朱毅农正在病中。

1934. 4. 15 日记：林行规先生夫妇邀朋友游秀峰山……前年我与丁在君住秀峰寺，林君嘱题山上新旧各碑拓本册子，我与在君各有诗，皆未留稿。

“前年我与丁在君住秀峰寺”之行也未见当年日记。

西山游中的伴侣

胡适在 1935 年 5 月 26 日记里感慨：“游山有可谈的伴侣是很可喜的事。”他的游伴多有留学英美的经历，有些还是同学，他们的郊游休闲方式也于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有关。在《胡

适日记》中出现50次以上的有53人，他的游伴都在此列。其中，蒋梦麟311次，丁文江215次，朱经农128次，任鸿隽212次，陈衡哲74次。可见他们交谊深厚，是很相得的好友。

胡适与蒋梦麟师出同门，相交、共事几十年，友情终生不渝。朱经农与胡适相识于中国公学，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其姑母朱其慧是胡适朋友熊希龄的继配夫人。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我们三个朋友”留美时就结为挚友，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说：“吾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朋友之乐，于斯为盛。”陈衡哲还是留美学生中胡适文学革命新思想最坚定的支持者，且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支持胡适的新主张，1917年，她率先用白话文写了短篇小说《一日》。任鸿隽、陈衡哲回国后由胡适力荐到北大任教，陈衡哲因此从第一位女官费留学生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胡适与丁文江的友谊更是一段佳话。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道：

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饭馆席上他总是用酒来给他的筷子消毒。他有几次看见我颇爱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那把扇子不幸遗失了。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¹⁴

丁文江特别看重、处处关心胡适这个朋友。胡适1923年10月19日记里有与丁文江在沪谈《努力周报》与北大事的记录，丁为胡献策：

移家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北回后，住

西山，专事著书，为中策。北回后回北大，加入漩渦，为下策。胡适以为，上策势有所不能，而下策心有所不欲，大概中策能实行已算很侥幸了。

1923年11月1日丁文江又致信胡适，劝他去西山养病：

你的病并没有全好。梦麟就决计不请你教书、并且要学生们少去麻烦你。所以我的意思劝你赶早回来；再迟天气变冷，路上固然不方便、而且要到西山去布置，也不如现在的妥当。西山的房子，仍旧是秘魔岩刘宅最为合宜，因为不但房间较多、较大，于带书、带家眷方便，而且离黄村车站很近，来往不必定要汽车。梦麟说碧云寺李石贞的房子可以借，文伯说房子不好，不如刘宅。等你回来自己决定罢。¹⁵

胡适1923.12.22日记也写到：

我在南方时，在君、新六为我借得刘厚生先生的秘魔崖房子，冬秀派人去布置好了，我因种种杂事，一时不得脱身上山。今日始上山。文伯与慰慈送我与祖儿到秘魔崖；傍晚即在西山饭店吃饭。饭后他们进城去，我步行回山。是夜为阴历十五日，月色佳绝，颇多诗意。

胡适此行在秘魔崖住了八天，是去西山时间最长的一次。秘魔崖的房子是时任北票煤矿公司董事长刘厚生在八大处证果寺中的别墅，与翠微山、平坡山上的寺院隔涧相望，独领一峰之秀。的确是一处修养的好地方。

胡适挚友林行规（字斐成）为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科学长。曾捐出西山秀峰寺旁的地产建立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

胡适在1938.7.20《日记》中写道：

下午得纽约转来一电，是蒋先生签名的，其意要我做驻美大使。此电使我十分为难。”

7月25日记，与林斐成兄谈。他力劝我莫辞。

7月26日记，我拟一电，说“二十余年疏懒

已惯，绝不能任此外交要职’，最后推荐施植之，
许以以私人助其疏导舆论。’林斐成兄见此电稿，
大不以为然，他不赞成我此时推却此事。

由是观之，国难当头，林氏是力促胡适就任
驻美大使之人。

与胡适多次同游西山的还有北大教授王微、
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等人。1920 年 8 月 1 日
胡适、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张慰慈、陶孟
和、王微七人联名在《晨报》发表《争自由的宣
言》，可见胡适游西山的伴侣都是些声气相通的好
友。

西山游留下的诗作

胡适常去西山游览，却没有写过《庐山游记》
那样的长篇大论，但从他留下了几首诗作中还是
可以看出他的审美情趣、文化品味和对西山的喜
爱。

1921 年 6 月 19 日，胡适和友人游西山到访慈
幼院，熊希龄送给他一盆兰花草。几个月后胡适
把他养顾兰花草的过程、心情与期待写成一首白
话诗。

希望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
望得花时过；
急壤看花人，
芭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¹⁸

1921, 10.4

上世纪 70 年代，台湾张弼和陈贤德甥舅两人，
把胡适的白话诗《希望》从十二句改写成十六句
的《兰花草》谱成歌曲，非常受人喜爱，遂在两
岸三地广为传唱。

1923. 12. 22 日记：

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沉思，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923. 12. 24 日记：

昨夜作一诗，本想不留底稿了，今天转念，
姑且写在这里：

暂时的安慰

自从南高峰上那夜以后，
五个月不曾经验这样神秘的境界了。

月光浸没着孤寂的我，
转温润了我的孤寂的心，
凉透了的肌骨都震动了；
翠微山上无数森严的黑影。

方纔还像狰狞的鬼兵，
此时都好像和善可亲了。
山前，直望到长辛店的一线电灯光，
天边，直望到那微茫的小星。

一切都受了那静穆的光明的洗礼，
一切都是和平的美，
一切都是慈祥的爱。

山寺的晚钟，
秘魔崖的狗叫，
惊醒了我暂时的迷梦。

是的，暂时的！

亭子面前，花房的草门掀动了，
一个花匠的头伸出来，
四面一望，又缩进去了。

静穆的月光，究竟比不上草门里的炉火！
暂时的安慰，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烦闷呵！

两天前胡适刚收到曹珮声的信，触景生情，
写下了这凄婉的诗句。一个月后（1924. 1. 27）仍
意犹未尽，又作江城子. 词一首，同是翠微山，同
样的心境。

翠微山上乱松鸣。
月凄清，伴人行；
正是黄昏，人影不分明。
几度半山回首望，一
天那角，
一孤星。

时时高唱破昏冥，一声声，有谁听？
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
记得那回明月夜，
歌未歇，
有人迎。¹⁹

1924. 1. 13 日记：与梦麟、任光、余文灿、张
希伯（荫棠）先生，同游西山。希伯先生年六十五，
精神尚好。他有别墅在玉泉山之南，名石居，旧
为和珅之弟的家庙，很精致。我们在石居吃饭，饭
后游西山，回来又到石居吃晚饭。饭后回城。……
今夜是旧历初入（腊八），在石居见月，月色极
好。……回家时，忽起大风，尘土蔽人，勉强睁
眼看那将落的月，已朦胧作黄色，令人起憔悴的
联想。

胡适心生感慨当夜有诗：

石居

松针筛月上眉头，心上凄清感旧游。
一样半规初八月，照人狂态照人愁。

石居在玉泉山去香山的路边，院主人张荫棠，
字朝弼，号少卿，曾任清廷驻美国公使。石居原
为妙应寺，坐南朝北，俗称“倒座”，为一进三
楹院落。有山门、前殿、配殿及后殿。院中松柏
参天，遮阴蔽日，是一座古朴幽静的院落。此次
同游西山中的三位后来都做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余文灿 1926 年代理北大校长，蒋梦麟 1930 年任
北大校长，胡适 1946 年任北大校长。

1930. 10. 6 日记：今天中秋，叔永一家同我去
游西山。从西山脚下，上到老虎山顶。此山在西
山八大处之最西，前后无遮拦，故望的最远。……
晚上与叔永、莎菲久谈。月色极好。

十月九夜在西山

许久没有看见星儿这么大，
也没有觉得他们离我这么近。
秋风吹过山坡上七八棵白杨，
在满天星光里做出雨声一阵。

1934. 4. 15 日记：林行规先生夫妇邀朋友去游
秀峰山。今天我和冬秀、小三、希吕、尔纲同去。
先游黑龙潭，遇熟人来游者很多；我带了希吕、
尔纲去看一块高士奇写的碑。……次到大觉寺，
杏花不很多。寺中两株玉兰正盛开，今年花不如
往年之多，但稀疏之中，丰姿较往年为胜。前年
我与丁在君住秀峰寺，林君嘱题山上新旧各种拓
本册子，我与在君各有诗，皆未留稿。今日见原
题册子，尔纲代抄一份，附在此。

谁创此者释子深，谁中典此法家林；
五百年中事翻覆，惟有山水无古今。
我游此地独心喜，佛若有灵亦应尔；
建刹养僧修四禅，不如开山造林福百里。
读秀峰寺新旧碑记，敬题小诗呈

斐成先生。

胡适二十一年八月

十八年后，1950.1.7 日记：林斐成先生（行规）的幼子继俭（北大法律系二年生）来看我，他谈起他去年四月起就告病假不去北大了，因为那时学生人人须“坦白”，排日程轮流“坦白”。

此时林继俭已与余英时、梅祖麟、高友工、张光直等同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林攻读生物化学，后来担任哈佛医学院生化系主任。这次会面中，胡适在一张花笺上为林继俭重书此诗。落款写到：

“此诗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作的，十八年后写给继俭。胡适 三十九年一月。”

胡氏手迹后来现身旧金山某拍卖会，最终拍至高价，为南京某藏家所得。

1932 年 6 月 14 日林徽音致信胡适大谈西山：

适之先生：上次我上山以前，你到我们家里来，不凑巧我正出去，错过了，没有晤着，真可惜。你大忙中跑来我们家，使我疑心到你有什么特别事情的，可是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如果真的有事，那就请你给我个信罢。

那一天我答应了胡太太代找房子，似乎对于香山房子还有一点把握，这两天打听的结果，多半是失望，请转达。但是这不是说香山绝对没有可住的地方，租的是说没有了，可借的却似乎还有很多。双清别墅听说已让□□夫妇暂借了，虽然是短期。

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错，并且他是极欢迎人家借住的，如果愿意，很可以去接洽一下。去年刘子楷太太借住几星期，客人主人都高兴一场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对门，虽是平地，却也别饶风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鲜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游卧佛寺，碧云寺，香山，骑驴洋车皆极方便。……

天气好得很，有空千万上山玩一次，包管你

欢喜不觉得白跑。徽音香山六月十四日²⁰

找不到胡适回林徽音的信。六月正是避暑游玩的季节，也许成行了不须回信也未可知。

胡适最后一次去西山可能是 1937 年 1 月 31 日。当天日记写道：

与冬秀、小三、郭绛侯夫人、郭丽兰同去游香山，天太冷，游的不舒服，就没有到别处去了。

没有胡适在居京的第三个阶段（1946.7-1948.12）去西山的记录。大概是被北大校长的繁忙事务、8 次南下开会讲演所累；形势骤变；再加上 1937 年 6 月女儿素斐与侄儿思聪迁葬西山万安公墓等等，游山的兴致已不复从前了。

胡适游西山只有少数几次留宿，他是如何当天往还的？从 1974 年罗斯玛丽·列文森对赵元任的采访可知大概：

“列文森：我猜测 1920 年你刚到清华的时候，从清华到北京城很不容易。到底有多远？赵元任：我记不清有多少英里了，但是坐人力车得两个小时。从清华坐公共汽车二十分钟可以到位于北京城东北的王府井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²¹

在 1933 年底胡适买了私人汽车以前，京城里已有汽车可租，加上胡适的朋友之多，用车绝无问题。按赵元任的说法推算，一个小时可到西山，用时与今天大致相同。

有一点需要补记的事，与香山慈幼院和熊氏家族颇有私交的胡适，曾在危难关头保护过慈幼院。胡适逝世后，毛彦文写文章纪念，后收入自传《往事》一书。其中有记：

同时还有一事，承胡先生协助，得以圆满解决。前述华北籍元老，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去世，归葬北平。他的夫人相信风水，多方找寻风水好的地方，几经选择，在香山看中风水很好的一块地，可惜面积较小，不够气派。刚巧这块地坐落

香山慈幼院经营的香山饭店后面，某夫人请人向我说情，要我把香山饭店改为墓地。如成事实，则香山慈幼院的经费来源，立成问题，况且慈幼院院址系前清皇室所捐赠，划有界线，系私产。我这院长系由该院董事会所聘请，无权将院产送人，窃想此例一开，演变所至，慈幼院将成公墓矣，因之未允所请。但当时北平市市长刘瑶章、市议会议长许惠东及其它要人相继来访，施以压力，甚至说如不答应，将请国府命令征用。情势逼人，我乃召开董事会，将此事经过及我的原则提会讨论。胡先生系香山慈幼院董事之一，对我主张，深为赞许。于是提议，在香山饭店内留一大房间，挂上某元老照片，为他家属春秋祭奠休息之所，议决通过。纠纷得以平息，此乃胡先生主持公道、乐于助人的美德，更永铭不忘。²²

胡适自 1917 年回国以后，一跃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叱咤风云，领一代风骚。这一切的取得，绝大部份是在北京完成的，而他挚爱这座文化古城，与喜爱北京西山不无关系。

（作者单位：民进中央）

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馆藏号：HS-JDSHSE-0420-009

²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1 册，黄山书社，1994 年，283 页。

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馆藏号：HS-JDSHSC-1683-006

⁴ 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开源书局，2020 年，254 页。

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馆藏号：HS-JDSHSE-0408-034

⁶ 胡适著：《丁文江的传记》，三联书店，2014 年，133-134 页。

⁷ 宋广波著：《丁文江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110 页。

⁸ 杨肖彭笔记：《新生活周刊》第 1 卷 第 13 期，胡适《青年的出路》演词，1934 年，5-6 页。

⁹ 《北洋画报》，第 26 卷 1273 期，1935 年。

¹⁰ 蒋梦麟著：《新潮与新潮》，中华书局，2017 年，159-160 页。

¹¹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47 页。

¹²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6 册，310-311 页。

¹³ 顾红亮编著：《杜威在华学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68-89 页。

¹⁴ 胡适著：《丁文江的传记》，三联书店，2014 年，73-74 页。

¹⁵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3 册，23，25 页。

¹⁶ 胡适著：《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83 页。

¹⁷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232-233 页。

¹⁸ 陈学勇编：《林徽音文存》（散文 书信 评论 翻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年，76-77 页。

¹⁹ 罗斯玛丽·列文森采访 焦立为译：《赵元任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92 页。

²⁰ 毛彦文著：《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156 页。

苏甲荣致胡适信六通

王震 整理

苏甲荣（1895—1945），字演存，广西藤县人，近代著名地图学家。1914 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部英文乙班，为地学大师张相文学生。191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氏著《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1917 年，升入文科哲学门，并于 1920 年 6 月毕业。毕业后，担任北大秘书及助教。1922 年，在北平创立“日新舆地学社”，出版中外地图及地学书籍。

国民革命以降，苏甲荣先后任第八军秘书、第十五路军秘书长、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地图海图制作改订专门委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农民部秘书、武汉大学历史地理教授等职。1928 年任教育部常任编审，次年辞职。“九一八”事变后，苏甲荣广聘各地研究员，绘制《日本侵略我东北地图》等抗日地图。1943 年 7 月 11 日，苏甲荣在

上海辣斐德路颍村十一号寓所遭日本宪兵队逮捕，此后屡遭拷打。抗战胜利后，因医治无效去世。（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第 336—337 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人物百年全书》上册，第 780 页）

苏甲荣就读于北大哲学系期间正值“五四”前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出版界亦颇为活跃。1919 年，李大钊、徐彦之曾委托苏甲荣在广西为《每周评论》寻找代派处（杨琥：《李大钊年谱》上册，第 572 页）。此外，苏氏 1919 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担纲事务，颇为吃重。《少年中国》月刊前四期即均以苏甲荣个人名义发行；1920 年 5 月，原编辑主任王光祈赴德国留学，改由苏甲荣担任，直至 1921 年 2 月第二卷第八期以后，方由左舜生接手。

胡适所藏苏甲荣信件，集中在 1919—1922 年间，话题亦未超出上述两领域。1919 年 8 月，苏甲荣的广西同乡李超女士病逝于北京，学生群体有意以此事件为契机，宣传女性解放事业。是故，苏甲荣收集李超信札交于胡适，委托其作传，即著名的《李超传》（刊《晨报》1919 年 12 月 1—3 日，及《新潮》同月 1 日第 2 卷第 2 号，收入《胡适文存》）。这一时期的苏甲荣致胡适信，无疑是了解此事台前幕后的重要资料。此后，苏甲荣还就自著《中国地理沿革图》出版一事与胡适多次通信。

苏甲荣致胡适信共六封。影印件多已收录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1 册，惟第 5 通仅收附件，漏收正文。现根据中国历史研究院藏胡适档案加以补录。

一

胡先生：我们所发《旧家庭高压下的牺牲》一段新闻，经《国民公报》——十六的——《民治日报》先后照登了，想先生已经看过。

你从前答应梁女士为李超^[1]作一篇传，已经作好了吗？李超的来往信札现在都在我这里，可以用作根据。但我现在没有工夫整理，等再过几天编次好了便送给你看，并且要请你把这篇文

章快点作好，因为我们要开一个追悼会，须先把他的传记印发同乡、同学，使大家都明白了才容易办。我们开追悼会的意思不单是表扬他个人，是要就此作一回妇女解放的示威运动。（等社会上不平的空气鼓荡好了，敝同乡还要设法使他的家庭捐一笔财产，办一间李超女学，聊作惩戒。）至于办法呢，就是敝同乡担任筹款，筹备外面的事项，将来开会地点则在女子师范，由梁女士惠珍^[2]在校内邀集同学办理。地点、日期确定后登报发表，还要请先生与毛校长^[3]加入发起人中。发起人就是李女士的同学和同乡的重要的人，其他主张妇女解放的如愿意加入，也想邀请之。现在先请你向毛校长说一说，然后梁女士在校内才容易进行，我想先生是必定能够帮忙的。还有一件就是有一位同乡程伯璘女士，桂平人，年十八岁，桂平女子师范毕业。他曾应考女子高等师范，因程度稍差，没有录取。现在想加入补习科，也请先生问一问毛校长行不行？敝省在该校的学生只有梁女士一人，黎瑶琼——黄君璁素的夫人——和李超刚到一年都死了，唉！真倒楣。我很望先生替程女士出点力。以一弱女子跋涉千里，无校可托，实在是困难极了！前承先生保证的敝友章剑君已入法文系上课旁听了，谢谢你。

学生苏甲荣
十月十九夜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36-009；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1 册，第 511 页。原文标点不全。仅一纸。

李超于 1919 年 8 月病逝。此信写于李超逝世后不久，故时间当为 1919 年 10 月 19 日。

注：

[1]李超（？—1919）：原名惟伯，又名惟璧，号璞真。广西梧州金紫庄人。多次尝试摆脱旧家庭束缚并外出求学。1918 年 9 月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先为旁听生，后转为正式生。1919 年 8 月，病逝于北京。（胡适：《李超传》）李超死后，北京学界为其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追悼会。

[2]梁女士惠珍：李超好友，时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在其鼓励下，李超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3]毛校长（1873—1928）：毛邦伟，字子农。贵州遵义人。1919 年 7 月至 1920 年 9 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二

胡先生：——我有事要和你商量，昨夜往尊寓，没有会到。我们都是很忙的人，会面是不同意的。还是通信便利，所以今天就不上你那里去了。

追悼李超的事，因为在《少年中国》登了启事^[1]，很惹社会的注意。近日常有人问我，这会何时才开。且冬寒将近，我们觉得更不容缓了。现在筹备已略有把握，拟于本月二十三日（星期）举行。会场择定女子高等师范。我要和先生商量的，就是要你替我们和毛校长办一个交涉。一、请他署名发起。二、答应在该校举行。三、酌派校中事务员，布置会场、帮忙一切。四、开会时答应当主席。等先生将意见疏通好了，我再与区遽见他一面。区遽已做了好机会该校学生的保证人，他是很认得的。

李超的惨死，没有一人听见不愤慨的。我很知他的同学和校长，极为之抱不平。只可惜广西的女学生太少了，才要到我们外面的同乡来筹备追悼。我们的意思，莫非向藉此鼓励求学的女子，打破旧家庭陈腐的观念。李女士既然是毛校长的学生，料他是必赞成我们的要求的。

发起人的名单^[2]，今钞寄一阅。这是已经确定的，还有女校的女生和教员好几位。要等梁女士接洽好了，再行添上。

女校里的广西学生，只有梁女士一人。我们又是男人，总觉有点不便。故此要请校内的办事人，多帮忙些。款项是由我们担任的。

开会那天，还邀请拟和蔡先生等前往演说。

你作的传，就请再这几天作好。俾得送登各报。并印数千份，于会场散发。

如何说话能够使毛校长赞同，请你费心商量，务得完满结果。并望你就马上进行，早日确定此

事。好等我们登报公布，以慰社会之望。那就是感谢不尽了。

学生苏甲荣上言

十一月七日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36-010；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1 册，第 512 页。仅一纸。

李超追悼会最终于 1919 年 11 月 30 日举行，故该信写于同月 7 日。

注：

[1]《少年中国》启事：见《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妇女号”（1919 年 10 月 15 日发行，该期首篇文章为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名曰《李超女士追悼会筹备处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李超女士，幼失怙恃，长受教育，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矢志求学。不幸受家庭之虐待，横被摧残。曩修业于梧州女子师范、广州公益女子师范，时几经艰阻，旋以姊丈之援助，跋涉京华，得受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其家庭素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姊丈筹济，备受责言，嫂抱不平，几以身殉。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至积悲成疾，资志以歿，闻者莫不同深痛悼。同人等对此刻日筹备追悼，俾慰女士之灵，聊以作生者之气。日期地点，俟确定后即登北京晨报宣布如蒙

各界诸君赐以挽章诗文，尤所感激，请交下列三处为荷：

宣武门外后青厂广西三馆 区遽

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 梁惠珍

后门内松公府夹道七号 苏甲荣。

[2]最终发起人名单：周绍昌、李大钊、陈钟凡、胡适、蔡元培、毛邦伟、伍树芬（女士）吴弱男（女士）、赵炳麟、关冕钧、李济深、梁溟、李超、林炳华、周家彦、林世焘、梁昌诰、秦树忠、黎桂森、林伯启、叶镜璐、罗振英（女士）、王兰（女士）、胡学恒（女士）、彭梦民（女士）、罗家伦、黎启祥、康白情、杨葆俊（女士）、胡瑛（女

士)陶玄(女士)、刘韵琴(女士)、雷荣甲、黄士嘉、李家荣(女士)、王绪贞(女士)、孙雅平(女士)、蒋粹英(女士)、顾翊娴(女士)、王宗瑶(女士)、林伯铭(女士)黄日葵、梁运曦、区諲、区家达、韦奋鹰、黄琮、陆善煜、谢起文、覃怀林、梁文瀚、梁惠珍(女士)、陈瀛、苏甲荣。(见 1919 年 11 月 19 日《晨报》第 1 版,《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三

适之先生:

今早我来找你,听说你有点病,所以现在我就不来了。

我前印沿革图样广告等件,印刷费大概在百元以上。现在因为印刷局改组,且近年关,来索百元。学校欠薪数月,我也不敢说先生定可以有借来,不过我想先生或者也可以向别处代借。我在商务有稿费数百元^[1],三四星期外可以取来,借一百元我想一月左右总可以还的。

我的图,至迟阳历或阴历年后总宜交款付印,过迟不但出版误期太久,且恐印局变更前议,则更难办了。广高^[2]款尚未到,到也不过一二百元,无济于事。前与先生谈借款事,不审是先生等自己集款呢,还是代向银行揭借?但是没曾说明白。现在终不能不盼望先生给我想一个方法!代向银行或向有产个人,揭款千元,年息一分,订期一年或八个月。书出后,取来各代售处定款,便可以还。如过年即能付印,出版期仍是四月底,至迟六月初,书款当可一律取来。

以上两事,请先生熟筹,覆我一个信。

生苏甲荣
十二月二十八日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36-011;
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1 册,第 513 页。

注:

[1]商务有稿费数百元:1916 年,苏甲荣就读于北大预科期间,曾在商务出版《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

[2]广高:据第 5 封信内容,应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1923 年 11 月更名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 年 2 月 4 日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 年 8 月 17 日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四

适之先生:

今天的风好大呵!我想到先生那里去,也气沮了!前几天子骏在济南的来信说:和先生谈起我的《沿革图》。你说“此种图,社会很需要。愿介绍出版。”我因为作这图,预科三年的功课,几乎没有一些不是糊里糊涂敷衍下去的!去这么大的牺牲,本来是希望早日出版。你的盛意,我是很感谢的。可是这种图本来不像别的书籍易销,而且成本又大。——以一千分计,需印费二千一百餘元,先要备资本一千元,方能开工。所以狠不容易商量。我也自己和武昌亚新地学社^[1]、沪商印接洽过。亚新是狠欢迎,却实在没有这种能力。商印虽有力量,但他本来以迎合社会心理图急利为目的的,那里肯干。亚新希望能够仿前清学部帮忙邹代钧^[2]地图的办法,以公款垫支印费。同文的曾纪熙——他是邹氏的门生,在武昌共事十多年。——对我说:亚新离京远,办理不便。劝我将稿取回。他就招集刻工,现在办了一个中国舆地制图社。他的动机,就是想承印我的图。但是学校穷得狠,虽曾和蔡先生商量过,一时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先生既愿意介绍,不妨向中华书局接洽,或者可以办到。如更有别的方法筹得印费,就近交曾君办理也好。图稿等暇日送阅再谈。前说把李超的事编剧,不知果有暇实行否?本月三日广州学生联合会在高师开大会追悼李超。梧州的追悼会议案,也经全城校长会议通过。这都是我们联络的。我们那里风气狠固闭,有此一举,实在令人听见了快慰得狠。

学生苏甲荣
九年一月十二下午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36-012;

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1册,第514—515页。仅一纸,作线装书内页式,版心下侧印“甲荣”方章。

“九年一月十二”,即1920年1月12日。

注:

[1]武昌亚新地学社:初名武昌舆地学会,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代钧创办,后邹代钧资助其侄邹永煊更名续办,其子兴巨、孙新垓曾先后经营。

[2]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号沅帆,清新化人,舆地学家。光绪十二年(1886)随刘瑞芬出使英法诸国,著有《西征纪程》。后创办武昌舆地学会,以新法绘地图。

五

适之先生:

今早送上图样一幅,想已收阅?

本校及高师购图垫款事,似都不甚成问题,蔡先生说要问过朱先生,朱先生也说要商准蔡校长,先生晤朱先生时,尚望再为言之。但现在八校经费又无着落,答应了还不知何日可以付款呢。所以我想着又向南高^[1](地理教员白月恒^[2]我曾认识)、广州高师(也有同学在那里可以说话)两处也试提议,前几天已去函了。南高史学系主任徐则林^[3],不审先生曾认识否?(广高史地部主任是伦达如^[4],教员有陈懋)或有其他相识可以为我介绍否?先生如需图样时,要若干即请示知。如各校垫款一时都未能达到,我亦拟于下月先借款付印,因为各处代售处都已接洽好了,广州高师学生贸易部说已代为广告,催寄预约券,我因为未得款付印,不愿意急急于售预约,至蹈了从前中华书局《中华字典》,不能如期出书的毛病,致失信用。借款事孟和先生曾提过,我当初的意思也是想借款的,后来想起学校能垫款,用不着就借款。若学校一时做不到,还是请先生与孟和先生代我筹一个借款的办法。还有一事要托先生的,就是各处的代售处都有了,只刚刚缺了上海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亚东同中华覆信均说出书后可以

代售,预约不便代售,大概是代售过预约而不能如期出版的,他们推测我们以为也是不甚可靠罢了。现在想托商务,那里虽有熟人,我想他也不过给我套一个信封送到代售课去,是无效的,我不愿再碰这个钉子了,所以要请先生给我向高梦旦写一封信,请他转知发行所,才有效的。并拟与商务交换广告,请他在《东方杂志》及《教育杂志》上代登四五期广告,只占篇幅半面,商务所出各种地图,《沿革图》也愿代登广告,此事(也)想先生也可以交涉的。诸事费心,至所感盼。

又李吴桢君^[5]言渠与叶馨君^[6]曾有试卷数本交给蒋先生,现在我找不着,请先生便中到蒋先生家时,检出直送注册部,并告我以便覆知李君。

学生苏甲荣

十九日

外付图样目录一份,可寄高梦旦。

附件:

敬启者:兹拟托

贵处代售《中国地理沿革图》预约券,办法列后。如承赞助,俾资推行,无任感盼。覆示请寄北京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筹办处,鄙人苏甲荣收。以便将贵号列入广告及样张内。一俟确定,即将预约券及目录样张寄上。尚此,顺颂台绥。

苏甲荣谨启

十一,十九。

代售《中国地理沿革图》办法

- 一、代售本图预约者,书价扣十分之一奉酬,惟外加邮费不在扣除之列。
- 一、函件往返代售一方,邮资归预约处自理。
- 一、代售预约券者,于开始发售后两个月内将售出数目结算一次,并将书价及邮费随同汇缴,出书前一月总结。
- 一、发行处收到代售预约处书价及邮费后,

即给以正式收据。

一、预约人与代售预约处同在一地者，书出后由发行处将书寄交代售处，待其自行到取；其与代售处不在同一地、须邮寄者，则由购书人挂号将券寄至发行处，由发行处直接将书寄去，以省手续，并免重耗寄费。

内容	随附例言目录一张	定价	布背金字每册五元 挂幅每套四元五角
形式	每幅纵十二英寸横 六英寸五彩着色	预约价	两种均照定价五折 外埠另加邮费三角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36-01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41 册，第 516 页（仅收附件，未收正文）。附件无标点。正文、附件各一纸。信封正面书“胡适之先生/苏缄/十九”。

1921 年 12 月 7—8 日《北京大学日刊》曾刊登广告载明，《中国地理沿革图》一书预约截止日期为 1922 年 3 月，发书日期为 1922 年 4 月底。此信及代售办法写作时间应在《北京大学日刊》广告登载前不久，故确定为 1921 年 11 月 19 日。

注：

[1]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2]白月恒（1876—1940）：又名白眉初，地理学家。苏甲荣与白月恒交情应匪浅，1925 年苏甲荣还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为白氏著作刊登广告。

[3]徐则林（1886—1872）：又名徐养秋，教育学家。1917 年赴美留学，1920 年回国，初任职于安徽省教育厅，后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任科主任和系主任职务。

[4]伦达如（1880—？）：伦叙，字达如。曾任中山大学、广东国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父伦常，兄伦明。

[5]李吴桢：时为北大哲学系学生。1919 年 6 月 26 日北大师生挽留蔡元培时，为学生代表。

[6]叶馨（1893—1977）：又作叶麟，字石荪。时为北大哲学系学生。1929 年获里昂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先后任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校教授。

六

适之先生：

前送上《沿革图》一册，想曾收到？先生原云要两册，当时因装订未齐，故只送上一册，今再送上一册。预约销路还不错，共售出约一千一百本左右，实可收银二千三百元，印费及广告费共约三千一百左右，不敷约七百元多，曾借过孟和先戚氏七百元，学校垫款五百元，先生一百元，印费已不生问题。惟孟和先生代借之款，本人并未知道，现银主由欧归，刻须归还，日前已还了三百，二三日内尚须交四百，故先生之款，须待稍售特价有款后，始能奉趋，想先生亦不急候此区区百金也。特此奉告，乞再假以日月。此祝 健康！

受业苏甲荣上
六，二五。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 1136-013；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1 册，第 517 页。仅一纸。

据信中内容判断，此信写作时间当为 1922 年《中国地理沿革图》预约结束、正式出版后不久，应即 1922 年 6 月 25 日。

（作者系自由研究者）

大文书局《胡适新选》伪书考

杨镇源

笔者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库”中偶然发现《胡适新选》一书，此书未被任何有关胡适的文集编入。原以为是胡适作品的新发现，但经仔细考辨，此书应系假托胡适之名的伪书。

《胡适新选》由大文书局（上海四马路）于 1945 年 7 月出版、发行，各大书局经售。

此书为一短篇小说集，共十篇，创作时间跨足 1939 至 1943 年之间，具体如下表：

篇名	时间
风雪	1939 年 10 月
一个做母亲的	1941 年 4 月
蟲	1941 年 5 月 11 日
人间	1941 年 8 月/3 月 30 日
一个人的一生	1941 年 11 月 16 日
废园	1942 年 7 月
露台	1942 年 11 月
镇上的人们	1943 年 6 月
森林的寂寞	1943 年 7 月
街	缺失

从总体来看，尽管这十篇短篇小说冠以胡适之名，其内容既缺乏思想深度，又在语言风格上显得无比粗俗，不甚符合胡适一贯语言朗润、主旨鲜明积极的特点，也不满足胡适自己提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¹的要求。无论是早年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真如岛》《东洋车夫》《爱情之动人》《苦学生》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申报》上发表的《差不多先生传》，行文习惯和文字风格都与其相差甚远。

再从时间上来看，胡适从 1938 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用于发表演说、宣传抗战和述职报告。纵观胡适这一时期的日记与来往书信，其主要通信对象无外乎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等职权中枢，就连同家人朋友的通信都是少之又少。

可知胡适就任驻美大使期间一直勤恳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将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抬高美国人士对我国的同情与敬意”²以及向国内汇报美国和国际的局势与环境。在这种高强度工作下，胡适不可能有太多舞文弄墨遣词造句的精力。

直到 1942 年 9 月 8 日交卸驻美大使职务，胡适才得以“脱离政治生活，使我得一正当的名义，安心回到学问的工作”。³这一时期胡适将精力大多放在《水经注》研究上，偶有小诗的创作，而绝无半点小说的影子。按照胡适的性格，倘若有任何的创作或发现，一定会向朋友展示并探讨。而这十篇短篇小说在日记与书信中毫无半点记录和提及，只有创作者并非胡适这一种解释。

大文书局本身是一实力极小的出版社，根据 1942 年的《上海特别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单》中登记信息可知，其登记资产仅有区区五千元⁴，在当时 200 余家同行中也是垫底的。而且大文书局出版的书籍数量极少，还有多部书籍是删减过的盗版书，如《海上新繁华梦》三册翻印自 1909 年汇通信记书局出版的《海上新繁华梦：绘图醒世小说》五册；甚至在删减翻印的基础上，还篡改作者姓名，如“何可人”所著的《反三国志》二十九回，实际上是翻印 1930 年卿云图书公司出版的、周大荒所著的《反三国志演义》六十回⁵。

倘若胡适真的要出版一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能力有限、劣行累累的小出版社？按照胡适的社会声望与人际关系，选择与之关系密切的商务印书馆或东亚图书馆更有可能。从《胡适新选》本身的粗制滥造以及大文书局其他盗版书来看，该书店很明显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甚至可以说是利欲熏心，因而制造这样一本托名的伪书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¹ 胡适：《论短篇小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适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 页。

² 胡适：《至傅斯年（1941 年 5 月 16 日）》，《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第 3 册，第 236 页。

³ 胡适：《至翁文灏等 6 人函（1942 年 12 月 7 日）》，《胡

适全集：中文书信集》，第 3 册，第 275 页。

⁴ 《上海特别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单》，1942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S313-1-25。

⁵ 《反三国志今日出版》，《申报》，1930 年 9 月 17 日。

抗战胜利后的胡适、傅斯年与北京大学

郭衍莹

编者按，作者系北京大学工学院校友。文章中说北京大学医学院、工学院成立的时间，我们并不认同，因为这两个学院都是抗战胜利后才成立的。但作者作为北大校友，有不少难得的独家材料，故我们仍刊发此文。但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

前言

在民国时期，胡适和傅斯年这一对师生经常是媒体宣传“师生情深”，“亦师亦友”的典型范例。据邓广铭老师介绍^[1]（邓曾同时是胡适和傅斯年的学生，曾任胡适秘书），胡只比傅大五岁。但每次二人见面，傅像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口口声声“老师”、“恩师”。傅后来他自己事业有成，名气几乎可与胡适齐名，但傅毕生师事胡适，并以胡为自己人生楷模。胡对傅也呵护有加，称他为“人间最稀有的人才”。不过这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别。胡待人热情，温文尔雅；傅性情急躁，不讲情面。当然二人也会发生意见分歧，甚至闹矛盾。最大的一次也许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如何对待和处理“伪北大”问题。当时胡适已被任命为北大新校长。在未到任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一年。傅对“伪北大”采取激进的，用现在词汇就是“形左实右”的政策。内容主要有二方面：1、在伪北大教过课的教师一个不用；2、伪北大所有学生必须去临时大学补习班学习一年左右，考试合格并经“甄审”后方能承认其学历，再送北大继续学习。这就引起广大北大师生强烈反对，掀起“反甄审”学生运动。但傅态度强硬，不肯退让，声称要“为恩师扫清障碍，为北大去除劣根”。傅代理校长一年后效果如何？有的文献认为，傅实现了他的计划，“仅用一年时间就使北大走上正轨”

^[10]。；但据参加过“反甄审”运动的老校友口述和回忆录叙述，傅的绝大部分计划后来都名存实亡，不了了之。

胡适正式上任后改为采取比较温和的“接收、改造”政策，纠正傅斯年一些过激的做法，才使北大对伪北大的接收、改造任务比较顺利完成。胡适还提出新的学院要引进国外新技术（美国新技术），加快“去日本化”和技术改造。胡适赞同北大的工、农、医学院成立日期可分别追溯至 1903、1905 年和 1912 年，而不是从 1946 年算起，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拥护。但也有少数老校友持反对意见。

我在 1949 年上北大求学时经中学老师介绍，曾有缘与邓广铭老师认识，他把我当“忘年交”；经常像讲故事那样，将北大在胡适当校长时的一些轶事、趣闻讲给我听。惜乎天妒英才，邓老师已于 1998 年 1 月北大百年校庆前夕仙逝。2008 年北大 110 周年校庆时，“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院校友会”（以下简称北工校友会）^[2]的负责人黄文一同志要求我采访当年北大的几位老地下党员，尤其是曾在伪北大工学院上过学的老校友，有宋汝桢（“伪北大”工学院土木系）、于敏（1944 年上电机系。二年后转物理系。我国二弹一星元勋）、张玉琴（建筑系）、殷大年（机械系）、赵谨怡（电机系）、刘桂敏（化工系）、韩大钧（电机系）、程

树德（土木系^[32]）、以及彭瑞聪（北医地下党教师支部书记）等 10 多人（注：以上老校友大都写有回忆录，登载在《北大岁月：1946-1949 的记忆》上）。还有老北大地下党创建人项子明^[21]，和对胡适最了解的地下党负责人马句^[22]等。因为这可能是最后机会（当时他们都已在 90 左右高龄），希望从这些前辈那里获得一些新的信息。我调研后总的感觉是，当年北大尤其是它的医、工、农学院的组织机构变动情况太错综复杂，有的老校友戏称，这足够写二本长篇小说，或培养二名博士生。同时我也感到某些文献对有些问题似有误解、误传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而本文只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1、胡适怎么当上北大校长？傅斯年怎么当上代理校长？

1945 年抗战胜利，北大准备从昆明迁回北平复校。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准备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至于由谁来正式出任新的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文教界人士起先都普遍看好胡适，因为胡是老“北大人”，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他在抗战中任驻美大使，他都有功于国家。

但蒋介石最先嘱意的北大校长人选却是傅斯年而不是胡适。虽然在表面上蒋对胡适这位学贯中西的知识界领袖颇能以礼待之，甚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求贤如渴的样子。如蒋请下属吃饭从不备酒；唯胡适例外。但在蒋介石的脑子里并不看好此人。我们从已解密的蒋介石日记^[3]中可以看出真相。例如蒋在 1942 年 10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蒋对胡有成见，其原因正如季羨林所说^[4]：胡适毕生鼓吹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直持批评态度。而且多次当面顶撞，使蒋下不了台^[9]。只是蒋还得靠胡适撑门面，表面上故意显示“豁达大度”而已。此外当时的西南

联大不断闹学生运动，使蒋介石深感北大必须选用一个铁腕人物当校长，帮助他稳定局面。傅是铁杆反共分子，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且一向鼓吹“反对学校布尔什维克化”。蒋自然愿意傅当北大校长^[5]。

其实傅斯年和蒋梦麟在起先也都不看好胡适。他们认为胡适性格软弱，遇事讲情面，办不成大事。适于做学问，不适于当校长。傅曾多次说过，“胡适学问比我深，办事能力不如我”。还说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他也可勉为其难，当正式校长。蒋梦麟更是一再放风，他有能力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并宣传过去就有先例^[6]。

但消息很快泄露到下面，民主广场的民主墙就出现“欢迎胡适先生回北大当校长”的大标语，还到处贴满各色各样的小标语。北大多位老教授更是联名上书给胡适和教育部，上称：“火得三炎，非（胡适）先生德望无济事”。北大师生对胡适为何如此热情呢？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此时的北大需要有一位像蔡元培那样的校长，领导北大来一次大变革。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三个学校中就数北大最为“老气横秋”。而且北大只有文理法三个学院，不如清华、南开都有工、农学院，所以不仅学生少（据“清华校史连载之八”，联大历届毕业生有清华学籍的共 726 人。有北大学籍的只 369 人），而且过去大批公派留美的学生（大多在美学的是理工等应用学科），学成回国后大都愿去清华、南开执教，而不愿来北大。北大教师队伍缺乏新生力量，不免死气沉沉。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级人物，自然受到欢迎。如法学院院长，老北大人周秉琳给胡适的公开信就很有代表性。信中说：“只有适之先生能来改善北大，并影响全国大学。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时候一样，别人不能当此任”^[7]。傅看到这种情况，经再三考虑，感到胡适毕竟是自己的恩师，不宜贸然僭越；更不宜与广大师生闹对立。所以赶紧上书蒋介石，托词自己患高血压，接任北大校长恐误校务。傅还和几位老人一起力荐胡适当校长。蒋无奈只好同意大家意见，于 1945 年 9 月 6 日宣布胡担任北大校长。并宣布在胡到任前（胡当时在美国治病），

仍由傅代理校长。现在不少媒体^{[5][8]}认为，傅牺牲自己，成全恩师。尤其其他给蒋介石的信词意恳切，感动了所有人，才使胡适得以顺利出任校长。作者认为这一论点至少不全面。

2、如何对待和处理“伪北大”问题？傅斯年推行一个偏激的，不切实际的政策^[10]

历史上老北大的主体就是文、理、法三个学院。远的不说，1928 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北京后，筹建“国立北平大学”，它主要整合京津地区所有专科以上学校；连北大的三个院也合起来成为平大下面一个院，称“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这就遭致北大师生强烈反对；并不断举行“复校运动”。1928 年 8 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恢复国立北京大学。不久平大的师范学院也被批准恢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但其他学院谋求独立或归并入北大的企图没有成功。不过平大各院甚至平大领导层很多人都是“北大人”（北大的教师或学生）。所以北大与平大的关系千丝万缕，又源远流长^{[11]-[14]}。平大撤销后，北大自然就成为平大各学院的归宿。所以傅斯年曾对原平大校长李书华说：“想当年你们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14]。

北大医学院的前身理所当然可溯源至 1912 年成立的北京医科学学校；它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我国医学界很多老前辈毕业于该校。北大工学院的前身可溯源至 1903 年成立的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它比清华大学还要早成立 8 年。北大农学院的前身可溯源至 1905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这三个学校后几经变动，至 1929 年都被归并到北平大学内。抗战前夕平大有农、工、医、商和女子文理等五个学院。抗战爆发后北大文理法三院在蒋梦麟带领下内迁至昆明，并和清华、南开二校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但平大工、农二学院则全部去了汉中，后分别与当时的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合并；平大的建制被撤销。战胜利后北大回北京复校，但平大的工、农二学院由于种种原因（如当地官员借口发展大西北）留在

西北，成为后来西北工大，西北农大的前身。而复员后的北大就没有工、农二个学院了。

抗战期间，日伪在北京以原北大和原平大校址为基础，也办了个伪北京大学^{[15][16][18]}。下面除文、理、法三院外还设有工、农和医学院。1937 年 1 月伪北大正式开场。第一任校长是钱稻荪；总监是汤尔和。教师中极个别为甘愿认贼作父的文化汉奸，如周作人；少数是有具体困难无法随校南迁的原北大教师，再就是在京津一带找来的失业教师等等。学生有多少？各资料提供的数据不一。据资料^[17]称，1946 年由伪北大去临时大学上补习班的，后来回北大的学生共 1562 人。而当年由昆明回北大的学生为 564 人；同年北大招新生 455 人。由此可见伪北大的学生可能比原北大的还要多。抗战期间“伪北大”已毕业好几届，毕业生大都流入社会；号称北方最大学府。于是北大就面临如何对待“伪北大”这个棘手问题^[17]。

当时傅斯年代理校长；此人作风强硬，办事果断泼辣，说话慷慨激昂，外号大炮。抗战时期他曾以抨击贪官污吏而闻名。他在来北大任代理校长前就宣称已拟好处理“伪北大”几条规定：（1）“伪北大”立即解散；不承认“伪北大”中的工、农、医学院。规定北大新的工、农、医学院都应从 1946 年成立算起。（2）凡是在“伪北大”当过教师的，一个也不留用。因为“汉贼不二立”；他说：“伪北大之教职员均係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4）凡正在“伪北大”读书的学生，都先去临时大学补习班学习。经一年补习和考试合格；并经所谓“甄审”合格后方能承认其学历，然后根据本人自愿，送相应大学继续学习。对伪北大的历届毕业生，需补交论文，以及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阅读后心得报告，再经甄审后，发给新的毕业证书，各机关方能录用。临时大学补习班于 1945 年 10 月正式成立。共有 8 个班：一班专收伪北大理学院学生；2 班专收文学院学生；3 班法学院；4 班农学院；5 班工学院；6 班医学院；7 班原师范大学学生；8 班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总班主任是陈雪屏（此人曾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后任北大训导长，配合

当局镇压学生运动。他规定《中国之命运》是补习班必读教材。因此尽管傅斯年天天喊“学生无伪”，伪北大的学生都感到自己被当作“伪学生”，遭到歧视。只是由于当局“宽宏大量”，没给戴帽子而已。

甄审学生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发现有无共党分子。据中共老一代地下党员项子明^[21]、宋汝桢^[20]、张大中等等人在回忆录中称，早在伪北大时期学校就有地下党员活动，而且很活跃。只是还没成立正式统一的党组织。直至他们奉刘仁同志的指令进入北京和伪北大，后和由西南联大复员回京的地下党员联系上，才逐步建立各级党组织。

傅斯年的甄审政策引起绝大多数学生的反对。1946 年 3 月，北大和北师大校友联合会首先召开“反甄审”大会，到会学生代表 600 人。他们据理申述：当年是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华北失守，日寇入侵北京才导致出现伪北大。现在把责任推给教师，把学生打成“伪学生”，公理何在？会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北大北师大校友联合会反甄审登记公开信”，呼吁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迅速联合起来，共同为争取自由、平等而奋斗。5 月 26 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在北师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要求立即取消甄审。会后还组织请愿游行。并派代表去北京行辕会见李宗仁。北大复校后第一代老地下党员宋汝桢，项子明等都参加这一运动。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作出让步。到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不得已正式表态：取消考试和甄审；补习班各级所有学生无条件按个人志愿分配至北大等校学习。有些媒体认为这是傅斯年和学生双赢，但宋汝桢等老校友则肯定认为是傅斯年政策的失败，因为后来“甄审”和考试都被迫取消。临大改为收容伪北大的在读学生。傅斯年原来的规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20]。

傅斯年的“伪北大教师一个不用”的政策也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当年北大内迁时，校方曾指定四位因年迈无法随校内迁的教授，即周作人、马裕藻（北大国文系主任）、孟森（近代清史奠基人）、冯祖荀（北大数学系主任）等人留守北京，

负责照看校产。四人中除周外，其他三人都坚守民族气节，拒不去“伪北大”讲课。可惜他们三人都没能等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那一天，就先后因病去世。除这四人外，也还有少数因年迈有病，无法南迁的老教师。至于甘愿当汉奸的只是绝少数（实际上，伪北大教职员中后来被政府以汉奸罪提起公诉，并被判刑者只有周作人、钱稻荪、文元模等几个人。其中文元模曾为伪北大理学院院长，后又任敌伪教育总署署长。在公审中突发死亡）。伪北大文学院有位叫容庚的教师，还在 1945 年 11 月 7 日《北平日报》上发表致傅斯年代理校长的一封公开信。内称：“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也待交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轰动了北京市民。据说容庚后来拿了这封信去找傅校长。被傅连声骂滚，轰了出去。容只好滚蛋，带一家老少去广东谋生。其实容是我国文字学权威级专家。也是古文学家，金石学家。后在岭南、中山大学当教授。是我国文字学专业方面的奠基人和引路人。他于 1983 年去世；学校和社会对他的评语是：“为人坦荡，刚正不阿，热爱祖国，热爱事业”^[19]。

但傅斯年还是不肯退让，并且一再发表激烈言论，说暑假后“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他就是要“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一些小报也趁机浇油拱火，渲染“这位血压过高的代理校长说，打死他也要明辨忠奸”。傅斯年后来首先是在医学院碰了钉子。最后还得由恩师来收拾残局。

3、傅斯年在处理“伪北大医学院”问题时就首先碰了钉子^[13]。

傅斯年上任后首先要处理师生数量最多的，最复杂的“伪北大医学院”问题。他按照“一个也不聘用”的原则，将大多数教师打发回家，少数有通敌嫌疑的教师（包括院长），就送法院公审，判刑坐牢。首先是医学院院长鲍鉴清（一度当过“伪北大”校长），傅认为他“附敌有据”。但河北高院认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傅又收集到鲍

的四条新罪状，向法院继续抗告。只因事前鲍预感凶多吉少，人早已“失踪”。法院遍寻无着，只好不了了之。

鲍是我国组织胚胎学专家。解放后受聘于解放军第一医科大学，担任该校教授和研究室主任。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出成绩。后又任卫生部顾问，全国政协 3、4、5 届委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们的世界观是能够改造的[23]。另据北医官网报道，北大医学院在 100 周年和 110 周年校庆时都曾挂出包括鲍鉴清、汤尔和等历届院长的巨幅照片（画像）。其中汤尔和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晚节不保，认贼作父，当过日伪汉奸。但他曾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北医的发展有过贡献。

不久傅就发现，由于他的“决不聘用任何在伪北大医学院任职的人员”政策，造成师资严重匮乏，绝大多数系的课程，尤其是基础课，手术观摩课，专业课等无法开课。民国时期，我国医务人员本来就匮乏。而北大医学院当时却集中几十名国内知名专家，如组织专家马文昭、病理学家胡正详、精神病专家许英魁、生化学家刘思职、微生物专家林宗扬、神经解剖学家臧玉淦、寄生虫学家冯兰洲、皮肤科专家胡传揆等等。现在都弃之不用，到哪儿再能找到这些顶尖级医务人员？

后来事情闹大，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赶紧出来调解：称“蒋公（指蒋介石）的意思是‘只问行为，不问职位’，可以在伪北大医学院中有选择地选用合适的教员。”傅斯年无奈只好作出妥协。第一步先选用曾在协和医学院执教过的教师。这样医学院才勉强开了几门课，勉强维持运转。

胡适正式上任后采取温和包容的策略；更正傅的过激做法。当然还有很多人事善后问题留给胡适去解决。弄得胡适家天天门庭若市。据邓老师说，胡适脾气虽好，有时也要发几句牢骚：“还得我来擦屁股”！

胡适很欣赏医学院师生把处理伪北医的工作说成是“北大对伪北大医学院的接收和改造”；

而不是“取缔伪北大”；既符合实际，又团结广大师生。同时也明确北京医科学校是北大医学院的前身。院成立日可从 1912 年算起。胡适还进一步提出医学院要“去日本化”和采用“协和模式”。因为医学院很大一部分教学设备和教材来自日本。二战后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医学水平有了迅猛发展。诸如激光、X 光、微波、以及先进的显示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都先后进入实用阶段。北大医学院通过引入美国先进医学完成去日本化，胡适还积极寻求美国一些医疗机构（例如“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 等）的援助。北大医学院能成功崛起为国内顶尖的医学教育机构，应该说其中有胡适一份功劳。

4、北大对伪北大工、农学院的接受和改造

北大对“伪北大”农学院和对工学院的接收、改造，大体过程差不多。据资料[28]称，1940 年伪北大招收新生的情况为：文学院 91 人；理学院 120 人；工学院 268 人；农学院 172 人。医学院 193 人。数据表明，工、农、医是考生热门专业。大多数考生考虑的就是毕业后能找到工作，争取有个铁饭碗。

“伪北大”农学院的首任院长是庞敦敏。他是位细菌病理学专家。他当院长没多久，又去加盟北京首家政府办的防疫机构，去生产菌苗，是我国首位生产生物制品的专家。晚年他干脆回苏州同里故乡，唱昆曲自娱自乐，安享晚年。所以农学院经常处于无院长状态。1945 年抗战胜利时，农学院在北京的海运仓。不仅校舍破旧，教学设备残缺不全，教师不足，学生仅二、三百人。在北大各院中人数最少（不过地下党员比率高；很多党员都曾参加过反甄审运动）。1946 年胡适任命俞大绂为新的农学院院长。并将校址迁至北京西郊的罗道庄。没过二年俞就把农学院办得风生水起。所以俞是北大农学院有功之臣，也是今日的北京农业大学有功之臣^{[26]-[27]}。

俞上任后的头等大事，一是招聘一批名教授，其次是解决员工和学生的住宿问题。俞大绂在解决这二大问题时遇到的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益世报》一位记者还在该报 1946 年 7 月

16 日上发表“俞大绂谈农院计划”一文，作了详细报道。但到了当年 10 月中，农学院已开始注册上课。二年后北大农学院已在办学规模、教学水平，科研成就等多方面跃居国内前列。农学院下设十个系，十个系主任都是国内著名专家。1948 年俞大绂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2 年院系调整时农学院从北大分离出去，单独成立新的中国农业大学

胡适校长对伪农学院一直坚持采取改造和团结的方针。新北农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当年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延续，并且接收和改造了伪北农。1947 年 9 月，北农庆祝成立 42 周年，并正式回归北大。胡适校长热情地表态：“现在之北大农学院，即为延续北农历史之学院；北大接办北农，决不敢抹杀北农一段历史”。2005 年 9 月 16 日北京农业大学隆重举行百年校庆活动，受到广大师生、校友热烈拥护和欢迎。当时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还专门致电祝贺。

至于伪北大的工学院，其教师和教学设备情况，学生人数等都要比农学院强得多，并已毕业好几届，毕业生达数百人。还有多名老教师，如院长阮尚介等。北大复员后，胡适任命新的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也许是受傅斯年的影响，马表示不愿接收临时大学 5 班，即伪北大工学院的学生^[11]，而宁愿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工学院。于是经教育部的协调，由北洋大学来接管伪北工，称北洋大学平部，并由老教育家陈荇民兼任主任。但没多久，北洋大学表示无力顾及在北京的工学院，教育部再度改变方政，撤销北洋大学平部，而将伪北大工学院这个烫手山芋扔回给北大。新的北大工业学院于 1947 年在胡适主持下正式开张。在师资方面马大猷对伪工学院的教师同样采取“一个不用”政策，而寄希望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再就是大量聘用清华大学工学院的老师来校兼课（但一遇到政治运动，他们就不来了）。1947 年 10 月 29 日工学院举行成立 44 周年纪念大会。胡适到会讲话，他说：“工学院历史很长，已有 44 年，已从一个专门工业学校发展成北大一部分；它虽几次改名，这不要紧，怎样改也是国家的学堂，是“咱们的”

学堂！”据报载，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也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

北工和北农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 1903 年和 1905 年，这在少数老校友中也有些不同声音。例如个别北农老校友认为，2005 年北农“百年校庆”是个伪命题。真正应该庆祝百年华诞的是西北农业大学。工学院的少数老校友认为，将北大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伪北大工学院，临时大学 5 班，北洋平部是五个没有组织传承关系的单位捆绑在一起不合理。尤其是把日伪的北工也捆绑在一起，不仅“篡改历史”，而且有损“民族尊严”^{[30][31]}。

其实我国一些大学经常变更校名和隶属关系，这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北大 110 周年校庆时，我有机会采访了几位在伪北大时入学的老学长。如宋汝棼、于敏、刘桂敏等人。比如 1944 年入学的化工系老校友刘桂敏，她说他“大一”时学校是伪北大的工学院。“大二”时抗战胜利，他上的是临时大学第五班。“大三”时是北洋大学平部。大四毕业班时是北大工学院。她自嘲自己是“四朝元老”^[29]。但校址（从 1909 年起一直在端王府）、教师、教学设备、教材（老北大的传统，用是英文原版教材，很多老师用英文讲课）等基本上没有变化。你能说他上了四所大学吗？你能说陈荇民爱国不如马大猷吗？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现象应该为大家所理解。

马大猷老师 1940 年 25 岁时就获得哈佛博士。31 岁时就被胡适破格聘为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院长。他就任工学院院长后立志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工学学府。他曾设想把电机系的电讯组和物理系的电子组合并，成立中国第一个电子工程系，这样可以综合理科和工科二方面优势。为此他早早就到处物色教师和学生。我在 1949 年考入北大时学的是化工系。但一年级化学成绩一直不佳，而数学和物理的成绩还不错。马老师发现后就动员我转系到电机系电讯组学习。所以马老师是我的恩师。

马老师这一宏伟计划后来没能实现。倒是清

华大学在 52 年体制调整时，在电信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无线电工程系。后来又发展出通信工程系，自动工程系，计算机系等等（国外也是这样发展的）。那次调整，整个北大工学院被合并入清华。毕业时我们毕业班几个同学奉命将北大的仪表仪器和电子设备护送去清华，我们也乘此机会“偷”听了几堂清华老师的讲课。有人问我们，北工的成立比清华还早，为何有的系后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说主要差距是师资不如人家。以电子工程专业言，清华的电讯组拥有孟昭英、常同、童诗白、闵乃大、顾毓琇等一批名师，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据老校友介绍，伪北工原也有好几位资深的老电讯工程师，经验丰富，但新北工不肯聘用。所以到后来北大的电讯组，马老师手下就剩几名年轻助教，成了孤家寡人。幸亏有来自北洋大学的胡筠教授，他既要讲无线原理，又要讲有线原理，同学们善意地揶揄他“上串下跳”。而如何发展电子专业的重任只好留给清华了。1956 年我参加国务院组织的“中国 12 年科学规划”大会（我在会议秘书组），遇到马老师，我曾谈了这个观点。他没有表示反对。但会后他回归科学院，改攻声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

当时胡适对工学院还是很重视的。他一开始他就和傅斯年联名写信给钱学森请他来北大担任工学院院长。他还积极筹划成立原子物理研究所，函请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张宗燧、袁家骝等九人回国筹备研究所和任教。并称已先后得到他们回信，“均已允来北大”。只是国内形势变化太快，这些美好计划就成为一纸空文。

当时驻北京美军曾将二战时美海军用的大功率扩音器一台送给北大；这台扩音器输出有九个喇叭，装在一块板上；绰号“九头鸟”。胡适把这台“九头鸟”交给马大猷，要他找几位教师（具体是陈阅德和蒋仁渊）在此基础上装一部电台，以备 50 周年校庆时他向全校师生，以及全北京市父老发表演讲。胡适自己经常抽空到端王府工学院了解电台进展情况。大家抓住机会请校长题词。保留至今有他亲笔提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

特刊”。另一篇是“北京大学工学院 1948 班毕业同学录”；该同学录最后附有一篇“工学院沿革记略”，记载了工学院从 1919 年到 1948 年发展过程。这是胡适唯一亲笔给北大毕业生同学录写的题词。至于这台“九头鸟”，后来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还立了大功。它将毛主席的声音不仅传遍整个天安门广场，传遍整个北京城，同时还传遍全世界^[35]！

（作者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03 所）

参考资料

- [1] 郭衍莹：史学界一代宗师邓广铭和他的三位恩师。《济南日报》2023 年月 11 日 8 版
- [2] 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百年院庆专刊》
- [3] 蒋介石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
- [4] 季羨林著：“为胡适说几句话”，“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5] 欧阳哲生：胡适：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 3 期
- [6] 张晓唯：1945 年北大易长风波。《爱思想》网，2019 年 5 月
- [7]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下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 [8] 李传玺：抗战胜利前后北大校长的易位。《书屋》2019 年 5 期
- [9] 凤凰网资料（2013.12.5）：蒋介石非议五四，胡适当场反驳
- [10] 欧阳哲生：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 5 期
- [11] 彬彬：北京大学工学院。《申报》1947 年 11 月 30 日
- [12] 于末：北京大学农学院。《北大化讯》1947 年 3 月 1 日
- [13] 张蒙：导入美国医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对伪北大医学院的接收和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21 年 1 期
- [14] 李丰耀：北平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分合。澎湃新闻，2017 年 3 月 14 日
- [15] 抗战时期伪北京大学始末。搜狐网，2019 年 7 月 18 日
- [16] 1940 日伪统治时期的“北京大学”。百家号网，2019 年 7 月 6 日
- [17] 沈克琦、赵凯华：复原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P. 30
- [18] 曹豆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文史精华》2005 年 3 期
- [19] 百度百科：容庚。
- [20] 高红十：宋汝桢：沦陷区“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P. 364
- [21] 项子明：回忆北大地下党一段组织史。《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P. 359
- [22] 马句：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的往事。《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2.9(53 期)，p. 47

[23] 鲍鉴清：百度百科

[24] 殷大年：回忆工学院的日子。《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P. 127

[25] 露桥：俞大绂和北大农学院。《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P. 259

[26] 正本清源，校史误判。-从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史是个伪命题谈起。知乎网 2014 年 11 月 10 日

[27] 老照片：日伪时期的北大农学院(1939)

[28] 朱丁寰：日本对伪北大殖民管控与奴化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21 年 4 期

[29] 刘桂敏：大学生生活及 1948 届毕业典礼回顾。《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P. 121

[30] 韩大钧：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史岂容篡改。油印材料。

[31] 黄文一：北京大学的工科教育和北大工学院，《北京

大学校友通讯》2001 年 11 期 p. 61

[32] 程树德：关于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21 年 3 期

[33] 董华：难忘的北大岁月。《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P. 399

[34] 王诗琴，黄文一，杜家贵：红楼寻踪。《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8.4(44 期)，p. 23（纪念北大校庆 110 周年）

[35] 郭衍莹：让开国大典的声音传遍世界。北京青年报，2020 年 1 月 1 日

[36] 北京语言大学 2013 届博士生席加兵的博士论文“胡适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研究”

[37] 李咏梅主编：青春梦•北大根。前言：北京大学工科教育沿革。北大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修订)

《胡适研究通讯》于2008年2月创刊，由于得到海内外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这个刊物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起到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的作用。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5万字左右，于每季度的第三个月（即每年的3、6、9、12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胡适研究会的内部刊物，供学会会员及相关学会间交流、阅看，非卖品。其电子版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网站上查阅。

《胡适研究通讯》自2013年第3期（总第23期）起，向作者致送稿酬。作者来稿，于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凡决定采用的稿件，即通知作者，此稿即不宜再投给别处。凡一个月后仍未得到通知的作者，其稿作者自由处理。

凡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本《通讯》不再刊登。

《胡适研究通讯》发表的文章，文责由作者自负；本《通讯》由宋广波主编。

《胡适研究通讯》是为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们以及对胡适有兴趣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投稿邮箱：hushi620224@126.com